

## The Paradox of Tianxia Co-existence: What Is “All Under Heaven”? Where Lies Its Surplus?

Joyce Chi-Hui LIU

天下共生的悖論：  
何謂「天下」？天下之「餘」在何處？<sup>\*</sup>

劉紀蕙<sup>\*\*</sup>

\* 本文初稿發表於「天下秩序與共生哲學國際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高雄，臺灣。Aug. 22-24, 2024。本人要向《文化研究》兩位匿名外審人以及編委會同仁致謝。這些審查意見提供本人進一步思考以及補充討論的機會。本人也要謝謝熟稔清朝史料的陳怡文博士所提供的寶貴資料，使本文得以具體考慮一些歷史細節。本文發展較為完整的英文版本，*Tianxia and Its Discontents: Confucian Political Theology, Coloniality, and the Global Order* 於 2026 年 6 月由 Routledge Publisher 出版。ISBN: 978-1-041-04576-2。該書為國科會專書計劃支持（NSTC 112-2410-H-A49-031-MY3），一併在此致謝。

\*\* 劉紀蕙，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研究員兼主任。聯絡方式：[joyceliu@nycu.edu.tw](mailto:joyceliu@nycu.edu.tw)。

## 摘要

本文提出的問題是：「天下」的視野如何構成了空間秩序？「天下」與「共生」為何存在著不可化約的悖論？「餘」的視角可否作為批判分析的起點？

本文的基本命題是，「天下」是一個視野的問題，一個既立足於世間、又超越於世間的視野。君臨天下，不同的國君看到了不同的版圖，而隨之征戰，併吞並納入不同邊疆部落的領土，並且以治理技術穩定統治的秩序。「天下」的版圖與邊界的移動，見證了漫長的土地爭奪歷史，以及伴隨著的治理暴力。每一次的邊界遷移，都是具體的殘酷行動。中國史就在漢族擴張收縮以及其他族群相互傾軋之間，在世界史發展的總的傾向之間，展開了其伸縮變化的曲線。「宅茲中國」的「宅」與「中國」，標記著無法化約的死亡地形學。

本文首先透過施密特對於「大地之法」的分析，說明「法」意味著「空間秩序的安排」，必然牽涉了土地佔取、分配與生產的過程，繼而提出中國傳統「天下觀」的視角，不同於施密特所說明的西伐利亞合約的歐洲秩序，卻恰恰說明了「大地之法」土地爭奪原理的啟動機制。

其次，本文藉由趙汀陽的論點，檢討中國的天下秩序如何展開了疆域擴張的動態地形學，思考「天下」視野是在什麼立足點所捕捉？如何勾勒其版圖？如何分配其空間秩序？本文指出，「中國」時時刻刻在變，其實一直不是同樣的「中國」；或者說，「中國」非「一」，中國是複數的，此「一」並非彼「一」。

第三，本文回到歷史，說明「天下」的政治神學如何形成，「宅茲中國」的「宅」如何遷移，以什麼物質條件來執行？版圖變遷的代價是什麼？維護秩序的制度是什麼？為何天下帝國的擴張具有殖民性格？本文檢討趙汀陽、葛兆光、汪暉、杜正勝與許成鋼幾位學者的論點，並指出天下擴張的殖民性格以及物質性部署。天下版圖的變化曲線實際上代表了疆域變遷的殘酷地形圖：「禮」是作為穩定內外上下以及強迫同化的文化秩序策略，而「刑」必然永遠隨著「禮」而出現，並以征戰兵武與教化控制而彰顯勢力範圍。

第四，本文討論 21 世紀的中國如何以「天下一家」、「和諧共生」等政治修辭，透過「一帶一路」，鋪展其天下版圖，形成了什麼樣的新天下圖景。本文提出的問題是，為何在此數位天下的基層，出現了前現代保甲制度模式的網格化管理。

最後，本文提出明末思想家方以智所思考的「物論」以及「餘」的位置，作為視角轉移，強調相對於「天下」的膨脹擴張視角及其物質性部署，「餘」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得以分析「天下」的極限及其所遮蔽的陰暗處，作為思考殖民認識論的批判性分析之起點。

關鍵詞：天下秩序、殖民性、儒教政治神學、大地之法（Nomos）、餘

## Abstract

This paper asks: How does the vision of *tianxia* constitute a spatial order? Why does an irreducible tension persist between *tianxia* and co-existence? Can the perspective of “surplus” (*yu*) provide a critical point of departure?

It argues that *tianxia* is fundamentally a question of perspective—a vision both grounded in and exceeding the world. To “rule all-under-heaven” is to produce a shifting cartographic horizon through war, annexation, and techniques of governance. Its changing boundaries testify to a long history of territorial struggle and the violence inherent in governance; each frontier shift is enacted through concrete and often brutal operations. Chinese history thus unfolds as a fluctuating curve shaped by cycles of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interethnic contestation, and broader world-historical forces. The phrase *zhai zi Zhongguo* (“to dwell in the center of the realm”) marks an irreducible thanatopography—a terrain inscribed by death.

This paper begins by drawing on Carl Schmitt’s analysis of the *nomos of the earth* to argue that “law” entails the ordering of space, necessarily involving processes of land appropriation,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It then proposes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ion of *tianxia* offers a perspective that illuminates the operative mechanism underlying such territorial contestation.

Second, engaging the arguments of Zhao Ting-yang, the paper examines how the *tianxia* order unfolds a dynamic topology of territorial expansion, asking: from what standpoint is the *tianxia* vision constituted? How are its boundaries delineated? How is its spatial order distributed? It argues that “China” is never a fixed entity but is constantly shifting; it is not singular but plural—this “one” is never the same “one.”

Third, returning to history, the paper analyzes how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tianxia* takes form: how “dwelling in this China” (*zhai zi Zhongguo*) is displaced and enacted through material conditions; what costs accompany territorial transformation; and what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sustain order. It argues that the expansion of the *tianxia* empire bears a distinctly colonial character. Engaging the works of Ge Zhao-guang, Wang Hui, Du Zheng-sheng, and Xu Cheng-gang, the paper highlights both the colonial nature and material foundations of *tianxia* expansion. The shifting contours of its territorial map constitute a brutal topography of expansion: *li* (ritual) operates as a cultural strategy for stabilizing hierarchy and enforcing assimilation, while *xing* (punishment) invariably accompanies *li*, manifesting through military force and disciplinary control to demarcate spheres of power.

Fourth, the paper turns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xamining how political rhetorics such as “One Family under Heaven”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together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tend a new *tianxia* formation. It asks why, at the infrastructural level of this digital *tianxia*, grid-style governance reactivates the logic of the premodern *baojia* system.

Finally, drawing on the late Ming thinker Fang Yi-zhi’s reflections on *wulun* (a discourse on things) and the notion of “surplus” (*yu*), the paper proposes a shift in perspective. In contrast to the expansive and materializing vision of *tianxia*, *yu* offers a critical vantage point from which to apprehend its limits and the obscured zones it produces, thereby opening a space for rethinking co-existence.

**Keywords:** *Tianxia* order, Coloniality, Confucian Political theology, Nomos / spatial order, The Remainder (*yu*)

## 一、前言：大地之法——天下秩序與空間分配

本文的基本命題是，「天下」是一個視野的問題，一個既立足於世間、又超越於世間的視野。君臨天下，不同的國君看到了不同的版圖，而展現了不同的治理技術。「天下觀」驅使君王調整視角，看到更大的版圖，而隨之征戰，併吞不同邊疆部落的領土，納入人口並且以治理技術穩定統治的秩序。「天下」的版圖與邊界的移動，見證了漫長的土地爭奪歷史，以及伴隨著的治理暴力。

黃帝大敗蚩尤，統一各部落，諸侯尊為「天子」。「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未嘗寧居。」東邊到海，西到空桐（河南虞城東北），南到湘江，北到釜山，「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司馬遷 n.d.）。這就是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最早的「天下」，也就是黃帝往來遷徙、征戰各部落而統一的河北北部、北京之西的區域。秦始皇滅六個諸侯國，併天下為三十六郡，一統中原。南征百越、北伐匈奴，疆域擴及東邊的遼東，西至臨洮，北抵長城，南達象郡，並且執行車同軌，書同文字，成為統一的中國（ibid.）。漢代武帝是另一個大幅度擴張疆域的皇帝，在位五十四年期間，打了三十多年的仗。如同班固在《漢書·西域傳》所評論，漢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外虛耗」（班固 n.d.: 12 冊, 卷 96）；班固在《漢書·昭帝紀》中也評論，「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ibid.: 1 冊, 卷 7）。西域、南越、東越、西南夷、朝鮮等地的征服，都是始於征戰，終於土地兼併，繼而移民屯田，設郡屯卒。

這個征戰歷史，從夏商周三代開始，到清朝結束，歷經一般被承認的最簡化的十二個朝代；但是，若包括分裂時期以及具有正統性爭議的諸王朝，例如南北朝、五胡十六國，遼、金、北元等時期，則共有八十三個王朝，各自以不同的國號自我命名。歷代君王為了要打天下，平天下，服天下，莫不宣稱其治理的天命與正統性。從原本的氏族部落定居地，到逐步擴張的天下格局，「天下」的邊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盛清乾隆年間軍事征服深入中亞與東北亞，版圖擴張達到 1300 萬至 1470 萬平方公里（含羈縻地），比明朝超出 600 萬至 800 萬平方公里，甚至在最大的時候達到 900 萬平方公里的差距，僅次於蒙元帝國，比起黃帝時期的「天下」，超出了二十倍，並成為日後現代國家宣稱主

權領土的依據。<sup>1</sup>

從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僅舉夏、西漢、五代十國、清代數例，便可以充分顯示出這些疆域變遷幅度之劇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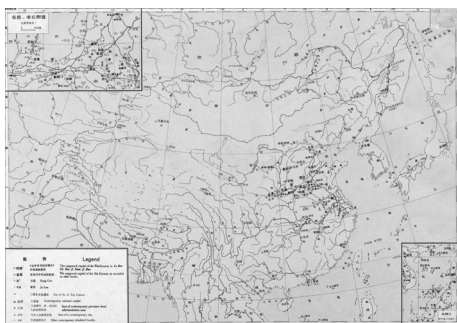


圖 1 夏時期全圖（譚其驤 1996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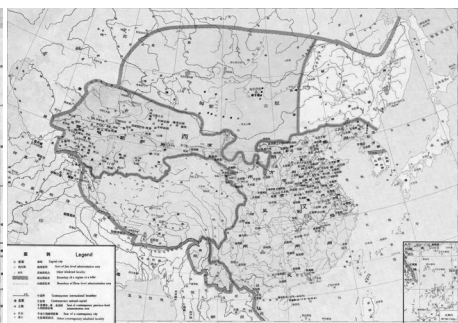


圖 2 西漢時期全圖（譚其驤 1996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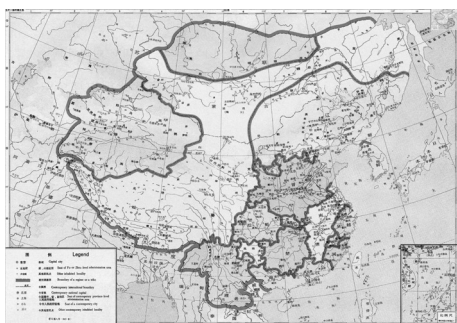


圖 3 五代十國時期全圖（譚其驤 1996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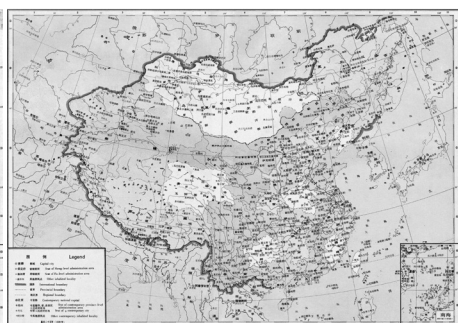


圖 4 清時期全圖（譚其驤 1996d）

施密特（Carl Schmitt 2016 [1942]）在《陸地與海洋：古今之「法」變》（*Land and Sea: A World-Historical Meditation*）中指出，世界歷史就是一部土地爭奪的歷史。歷史變革發生在空間意識與空間秩序的革命過程中，也展現於土地掠奪以及設定空間界線的立法過程（ibid.）。施密特認為：

任何一種基本秩序都是一種空間秩序。人們把一個國家或大陸的憲法稱為基本秩序，所謂的法（Nomos）。真正的、源初意義上的基本秩序，本質上建立在某種明確的空間界線的基礎上，也就是某種標準

1 可參考（Martin Stuart-Fox 2003）。



和土地分配的基礎。因此，在任何一個偉大時代的開始階段，都會發生大規模的土地掠奪事件，尤其是每一次地球圖景的重要改變都與國際政治的變化、新的領土分割以及新的土地掠奪聯繫在一起的。（ibid.: 41）

施密特（Schmitt 2003 [1950]）在《歐洲公法中之國際法的大地之法》（*The 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Jus Publicum Europaeum*）一書中，更為明確地展開了他對於「法」的分析。「Nomos」一般翻譯為「法」，也指傳統、習俗與規範。不過，施密特指出，如果僅僅停留在「律法」的理解，就會忽略了這個活動根本的佔取本質。這個源自於希臘動詞「nemein」的「Nomos」，「法」，意味著佔取、分配與生產。人類歷史總是隨著土地的佔取、劃分、使用、墾殖而展開，包括了遷徙、殖民、征服以及地理大發現，也意味著「法」的制定，以及「空間秩序的安排」（the ordering of space）（ibid.）。

施密特指出，不同時期對於「nomos」的詮釋反映出社會經濟條件的改變。遊牧時期牧人的法則（*nomeus*）是滋養他的羊群，君王則照料他的人民，這個時期的政治與經濟是分離的。到了城邦時期的「家屋治理」（*oikonomia*），則已經是政治經濟合一，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不分，開始了土地佔取以及分配的治理模式，也建立了父系家長制的權力結構。<sup>2</sup>施密特也指出，「Nomos」雖然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意義，但是根本上是以「Nahme」作為第一個階段，因此必然具有佔取擴張的帝國性質。<sup>3</sup>「Nahme」與「name」有關聯，牽涉了佔取、命名、擁有以及確認權力範圍的行動；換句話說，除了佔取—分配—生產的活動之外，「Nomos」具有權力朝向可見性展開的奠基與立法構成的面向，也就是命名、權力、可見度、公開化與儀式性的活動（Schmitt

2 施密特根據普日瓦拉（Erich Przywara）的字源學研究指出，「nomos」是猶太人被放逐後才形成的律法概念，荷馬史詩中多處出現「Nomos」的使用，尤其是重音在後的「Nomós」，意指牧草地（pasture），或是一塊可居住之地（a dwelling place），與律法概念無關。此外，Przywara 也指出，舊約聖經創世紀中「pneumatic logos」與「oikonomia」有根本關聯，「oikos」意指神的家（the house of God）；神的家之下的律法是統一的，因此，經營神的家就是宇宙的律法。斐洛（Philo）對比了摩西律法五書（《創世紀》、《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中對於土地佔取以及分配的律法概念與法利賽人的律法概念。斐洛認為「nomos」是法利賽人建立起來的概念。同樣的，荷馬史詩中的英雄也沒有律法概念。（Schmitt 2003 [1950]: 336-345）

3 施密特明確提醒我們：「即使在今天，僅僅記得 nehmen（取佔）與 Nahme（命名）構成一個實質性的問題，而不提及它們同時也意味著殘酷的帝國主義、原始的犯罪性，以及對進步的施虐式對抗，都是不安全的。」（Schmitt 2003 [1950]: 346）

2003 [1950]: 345-349)。

施密特將人類居住的大地視為一個整體，而以「*Nomos*」的概念進行分析這個大地之上人類活動的共通法則。根據施密特的說法，人類歷史第一階段的大地之法，從佔取土地、圈地、墾殖、生產與使用開始發展；這個階段的人們建築圍籬與城牆，只知道自己的世界，而並沒有全球的想像。但是，十六世紀歐洲向外擴張，發現了更大的海洋與更大的陸地之後，第二階段的大地法便開始進行。除了對於陸地的佔取之外，也包括了對於海洋的佔取：從發現美洲到最後發展為十九世紀對於亞洲的瓜分，延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施密特指出，帝國主義以殖民擴張作為社會問題的解決途徑，證實了竊取搶奪的公開化。無論是社會主義者或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都無法避免奪取、分配、生產的基本人類社會活動，也無法解釋產業革命之前的土地資源佔取，或是解決產業革命之後的產業佔取，更無法實行合理的再分配（Schmitt 2003 [1950]: 324-330）。

對於施密特而言，第一階段的陸地佔取與第二階段的海洋佔取呈現了不同的意義。施密特認為由於歐洲內部是基督教世界，一個具有同質性的「大空間」（*Großraum*）或是「經濟體大空間」（*Großraumwirtschaft*），因此有一個可以共同維繫的秩序；若是發生戰爭，也會在基督教世界以及神聖羅馬帝國的律法下，維繫特定的勢力平衡。然而，向海洋拓展的勢力，則打亂了這種平衡。不同於國家、殖民地、保護國等勢力範圍佔取土地的劃分模式，海洋的特性是自由與開放的海洋。沒有任何邊界，可以被不同國家開採，當然這也意味著對於發動戰爭的自由。海洋權力（*sea power*）成為關鍵性因素，擁有海權，便可以擁有全球的海域，也可以發動全球性的戰爭。關於陸地戰爭的國際法也不同于海洋戰爭的國際法：陸地戰爭不是兩國人民之間的戰爭，而是兩國軍隊的戰爭，只有敵軍是敵人，而國際法不會涉及人民的私有財產；然而，海洋戰爭則是貿易戰爭，任何與敵方有貿易往來的國家都成為了敵人。私人的財產可以成為海上圍堵之下合法的戰利品。施密特認為冷戰時期是第三階段的大地法，所謂的歐洲中心的大地法已經被瓦解，而轉向了西方與東方的對峙，這也是海洋與陸地的對峙。面對五十年代的冷戰局勢，施密特曾經提出新的「大地之法」發展態勢的三種可能形式：第一種形態是美蘇對峙的局勢中，其中一個勢力戰勝另一個勢力，顯然施密特並不看好這個發展趨勢；第二種形態是回到第二階

段的模式，但是讓美國取代過去英國所扮演的角色，維繫全球的勢力平衡，這是當時明顯的趨勢，但是並不確定可以維持；第三種形態則是多個獨立的大空間之間的平衡，也是施密特對於未來發展的期待（Schmitt 2003 [1950]: 354）。

施密特的立論，顯然是以歐洲中心的視角所描述的世界史，而且是以強權作為維繫平衡的基礎。他在 20 世紀中期的判斷令我們訝異，因為目前的世界局勢似乎是朝向第三種模式發展，也就是多極強權平衡發展的時期。但是，所謂的多個內部同質大空間的假設，並無法保障各別「大空間」內部不會發生佔取、剝奪與壓迫的權力運作，以及不同大空間之間擴張的競爭關係。此外，雖然 1989 年蘇聯瓦解以及冷戰結束，後續發展卻出現了各種歐洲內部的邊界戰爭，非洲的內戰與種族清洗，東亞地區的海域爭奪，緬甸軍政府政變與羅興亞難民。進入 21 世紀，短短二十年間，我們更目睹了中國崛起、中東戰爭、俄烏戰爭、加薩戰爭等大規模的空間秩序爭奪之勢。各種物質條件的改變與科技技術的發展，也更促使不同地緣政治對立方式的巨大改變，甚至是多極強權競爭的態勢。

本文提出的問題是：21 世紀仍舊進行中的大地之法，是以什麼邏輯進行的？中華帝國的「天下」概念，是否可以協助我們重新思考空間秩序的問題？趙汀陽以及其他中國學者所提出的「天下」理念，使世界成為一個再無任何外部性的萬民共享社會，所謂「協和萬邦」的大一統國家，使萬民萬物共生的理想，可能實踐嗎？

討論「天下」的同時，更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天下」的構想背後，是誰的視角？「天下」的物質性實踐，具體而言，要如何達成？「天下」的秩序，如何被宣稱、描繪、維持，或是擴張？「天下秩序」為何出現了權力擴張的殖民性格？「天下秩序」之下，是否有共生的可能性？

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天下」是否恰恰說明了「大地之法」的土地爭奪原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土地爭奪背後的動機？

本文的核心論點是，「天下觀」的視角，解釋了「大地之法」土地爭奪原理的啟動機制與動力來源。中華帝國的歷史過程顯示，天下視角可以透過武力擴張、儒教官僚體系以及禮制基礎建設，而完成了歷代不同族群政權爭奪與遞



壇的權力結構以及治理模式。本文將說明，「天下秩序」提供了不同於施密特「大地之法」的空間秩序。作為土地爭奪的原理以及啟動機制，「天下」是一個無所不包的視野，也是宣稱領土所有權的動機與說詞：皇帝作為「天之子」，擁有天命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配置以儒教政治神學的官僚體制與論述架構，而使得「天下」得以體現明確的內外區分與尊卑秩序。這是一整套殖民認識論的操作。

以下，本文第二節將先藉由趙汀陽的論點，檢討中國的天下秩序如何展開了疆域擴張的動態地形學，思考「天下」視野是在什麼立足點所捕捉，如何勾勒其版圖，如何分配其空間秩序。本文將指出，「中國」時時刻刻在變，「中國」非「一」，此「一」並非彼「一」。本文第三節回到歷史，說明「天下」的政治神學如何形成，「宅茲中國」的「宅」如何遷移，以什麼物質條件來執行，版圖變遷的代價是什麼，維護秩序的制度是什麼，以及為何天下帝國的擴張具有殖民性格。本文檢討趙汀陽、葛兆光、汪暉、杜正勝與許成鋼幾位學者的論點，並指出天下擴張的殖民性格以及物質基礎。本文說明，天下版圖的變化曲線，實際上展現了疆域變遷的殘酷地形圖，「禮」是作為穩定內外上下以及強迫同化的文化秩序策略，而「刑」必然永遠隨著「禮」而出現，並以征戰兵武與教化控制而彰顯勢力範圍。第四節，本文討論 21 世紀的中國如何以「天下一家」、「和諧共生」等政治修辭，透過「一帶一路」鋪展其天下版圖，而形成了什麼樣的新天下圖景。本文質問，為何在此數位天下的基層社會結構，出現了前現代保甲制度模式的網格化管理與思想控制，甚至帶有種族化區隔的殖民性格？最後，本文提出方以智所思考的「物論」以及「餘」的位置，作為視角轉移，強調相對於「天下」的膨脹擴張視角及其殖民認識論的物質性部署，「餘」提供了不同的視角，使我們得以分析「天下」之極限，及其所遮蔽的陰暗處，從而作為思考共生的批判性分析之起點。

## 二、中國的天下秩序，如何展開了疆域擴張的動態地形學？

### （一）趙汀陽的「天下」理念

趙汀陽的「天下」理念是 21 世紀天下觀的代表性模式。他將世界作為一個政治單位，超出國家尺度，意味著整個世界範圍內部都被包含於天下之內，

沒有任何歧視性或拒絕性原則，不會否定某些人參與天下公共事務的權利，執政權利是對世界上任何民族開放的（趙汀陽 2003, 2015, 2016a, 2016b, 2016c, 2023）。「天下／帝國」的理念以「無外」為原則：所謂「無外」，英文翻譯為「inclusive」，意味著「只有內部而沒有不可相容的外部」，只有內在結構上的遠近親疏關係，而沒有不二的「他者」。至於中國歷代所稱之「蠻地番邦」，趙汀陽認為，在「無外」的天下之內，沒有被設立為不可共存的對立面或是異端的他者，沒有被定義為意識形態和種族上的受歧視者。因此，他認為「天下」理念可以克服文化原教旨主義，並且以「名」來定義社會位置，承擔責任。「天下」理念是面對世界的責任（趙汀陽 2015）。

趙汀陽相信，在這個具有理想性與烏托邦性格的「天下理念」之下，可以建立超越單一國家的「普遍秩序」：「世界秩序的建構首先需要承認『天下無外』的先驗概念，然後以世界內部化的政治邏輯去建立世界普遍秩序。」（趙汀陽 2015）趙汀陽強調，天下理念是一個理論準備，提供了世界先驗一體性觀念、他者哲學以及和諧理論的框架，等待被實踐（趙汀陽 2003）。趙汀陽進一步以「博弈論」與「漩渦論」，解釋中國歷史連續而重複的動力：「中國作為漩渦動力模式，具有向心力與自身強化的力量。中國的擴展不是來自向外擴張的紅利，而是來自外圍競爭勢力不斷向心捲入漩渦核心的禮物。」（趙汀陽 2015, 2016c）。

在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神學概念〉中，趙汀陽解釋，天下秩序能夠化解漩渦的激烈衝突，形成一個兼容並蓄而萬民共在的大一統國家，也創制了權力分治的一體模式。天下體系作為中國古代整體運行所內嵌的「深層基因與密碼」，展現出內含天下的中國是一個神性的存在。在歷史過程中，以中原為漩渦形成的聚點，不斷擴大，使世界成為一個再無任何外部性的萬民共享社會，所謂「協和萬邦」的大一統國家。趙汀陽指出，這個大一統國家是和平生息的需要，而根據《周易》的存在論原則，說明「生生」乃是存在的根本目的，有利於萬物萬民的存在狀態。除了大一統的信念之外，還有勢不可擋的客觀動力：以中原精神為號召，歷史行動者參與這場長期的博弈遊戲，使中國成為萬民匯集之地，多線索交織而成，多族群文化互化，促使歷史過程不斷重複發生；逐鹿中原，如同有強大向心力的漩渦模式，相關者抵抗不住漩

渦的誘惑而前仆後繼地主動加入遊戲。這個博弈漩渦逐步擴大，最終達到穩定形成的「廣域中國」。根據趙汀陽的理論，基於這個中原聚點模式，中國以「天下」為內在結構，在歷史變遷中無限開展，「存在尋求自身永在」，生生而日新的方式（趙汀陽 2015, 2016c）。

趙汀陽以「變－在」作為解釋中國歷史連續性的「存有論」。他認為，中國的精神世界始於新石器時代，而基本成型於周代。中國思想框架中，存在是以「變」為「在」，因此，他所提出的存有論，是以《易經》為本的觀點：「以變而在」的存在（ontology of becoming）。中國存在之本在於其「變在」之方法論，他稱之為「作為方法論的中國」。作為方法的中國一直保持屬於自身之「今」的歷史時態，中國也因此「仍然是中國」（趙汀陽 2016a: 5-13）。

為了解決當今世界的問題，趙汀陽進而試圖提出一個「新天下體系」：新天下體系是一個謀求人類普遍安全以及共享利益的制度，是「世界的『無外』（inclusive）監護體系」，「監護世界以共在（coexistential）方式作為存在方式，放棄自現代以來的排他（exclusive）存在方式，從而避免人類命運的徹底失敗」。他強調，天下體系並不包含帝國的征服性、霸權性和敵對性；相反地，天下體系具有兼容性、共享性和友善性，因此天下體系具有反帝國主義特性，並且是以「關係理論」為準的普遍共在關係為秩序（趙汀陽 2016b: 5-22）。

關於「天下觀」，有不少中外學者為其辯護。松平德仁（Tokujin Matsudaira）便是其中之一。在一篇文章〈天下，或是另一個大空間？〉（“Tianxia or another *Grossraum*?”）中，他提出天下概念是一個中性政體模式的理想型，「天下」代表中國經典所傳達的理想國際關係，是一個共和體系（*res publica*），是各國之間透過共同遵循的法律規範，而共同維繫的合法化關係。松平德仁不同意一些日本學者關於日本的朱熹學派促成日本和東亞威權主義誕生的主張，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及右翼發展的原因。他反對儒教秩序必然是威權主義的說法，並認為「天下」的王道模擬自然秩序，是政權中立性質的理型（*regime-neutral ideotype*）。此外，他認為明清時期的內縮政治，正好與同時期西方帝國擴張與殖民統治的模式相反（Matsudaira 2022）。

然而，這種講法大有問題。明清時期恰恰是專制集權極盛時期。明朝東西廠與錦衣衛對於人民思想的嚴厲監控，清朝擴張領土，殖民邊疆部族，同時進

行內部種族化的治理以及延續數代的文字獄，乃是不爭之事實。松平德仁認為明清之際中國內鎖，而無擴張，是對於歷史的無知。他所提及老子、孔子、孟子與易經等思想典籍對於「天」的說法，其實彼此不同，也不見得是日後君王所想像的「天」與「道」。

另有學者以「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state）來說明中國的「天下」，指出其烏托邦性格以及朝向理想的規範性，而具有成為國際主義的潛力。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認為中國歷史、價值觀和治理模式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中國的崛起將徹底改變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秩序，但中國不會變得像西方一樣，而是會以其獨特的文明和文化塑造世界（Jacques 2009; Tang 2023）。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其政治和文化影響力也將迅速擴展，並重塑全球權力結構。

這些學者假設中國朝代替換是延續了同一個文明型的帝國型態，但是，正如米華健所言，這種說法其實抹除了多個族群的複雜差異，也美化了殖民主義操作的事實（Millward 2024）。此外，盛清時期的疆域擴張，其面積是西歐的兩倍，印度的 1.5 倍。18 世紀的西征，殲滅了準葛爾，納入了新疆、西藏、四川等西部及西南地區，造成大量死亡人口。這些殖民擴張的歷史，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歷史事實。本文第三節將繼續深入分析天下的殖民性格以及其物質性部署。

## （二）趙汀陽「天下體系」歷史詮釋的悖論

只要仔細閱讀趙汀陽的歷史詮釋，便會清楚看到其中的悖論。

趙汀陽以規範性建構論所提出的「天下體系」，以正面方式提出關於帝國的理想型，並且以「變—在」的存有論，說明中國漩渦模式持續擴張並且維持大一統的歷史連續性。趙汀陽的提法暴露出了明顯的內在矛盾。趙汀陽認為中國天下體系之下，不會如其他帝國一般存在著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對立；中國只有邊疆（frontiers），而沒有邊界（boundaries），天下體系甚至沒有文化邊界的存在。

這種「正面」（positive）提出的理念或是宣稱，以歷史中不同時刻正面地發展的論述為依據，會忽略了歷史發展中不同歷史環節「彼時當代」必然同時存在了不同的時間性，不同軌道交會的不同身體，以及各種負向（negative）

運動以不同方向溢出的思想情感空間。不同的身體攜帶著不同的主體經驗與歷史痕跡，交會碰撞時更會產生不同的運動，發生不同的思想空間，也會促成不同的歷史發展方向，甚至是背向發展的軌道，或是正負並存的空間。換句話說，忽略了物質性辯證運動的複雜體系，就會簡化天下的組成份子，也就是各個部落族群的生存空間與生存狀態。每一個存在，都有不同的時間性，不同的主觀經驗與歷史過程。

如果無法認知這些組成份子各個不同，各有各的立足點與權力關係，「天下無外」的歷史詮釋便會出現去歷史化與去時間化的盲點。否認相互之間的差異，更意味著看不到他者的存在，聽不到他者的聲音，無法體會他者的處境，也不會因為相互體會而調整自身的立足點，讓出轉圓的共生空間。

此外，趙汀陽提出「天下體系」的漩渦運動，忽略了空間的多重複雜性。歷史運動是多點進行的多重權力漩渦，而不是以一點為核心的向心運動。如果我們要討論「歷史本體論」，也就是歷史運動的「存在—邏輯」（onto-logy），我們必須認知到歷史環節中以進行式的存在運動並不是預先決定的目的，而是在不同歷史時空與不同物質條件之下，不同行動參與者攜帶著不同的背景與目的，偶然交會形成的。

歷史過程並不是重複發生的向心漩渦，而是不同權力中心與不同的存在意志出發，而發展出不同幅員或並行或交錯重疊的擴張運動。

我們可以透過多點漩渦的模式來思考這個複雜的過程。「天下」的視角，其座落處乃為一個「虛位」，任何人都可以取而代之。所謂「逐鹿中原」，並不是地理位置的「中原」，而是任何人可以宣稱天命所歸的「虛位」，一個變動的權力中心。佔據此「虛位」者，仍舊有其主觀位置，而必然存在著界分我他、內外以及高下等差的張力。「中國歷史」中驅逐異己、排除非我族類的名份、策略、制度以及刑罰，歷代皆然，罄竹難書。儒表法里或是陽儒陰法的共構，更是展現無遺。所謂的「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個聚點。同時段發生的多點運動，或大或小，可能會重疊，也可能會被併吞，更會有不同的歷史敘事出現，例如中亞史觀、東南史觀、曼陀羅史觀、俄羅斯史觀等等。

趙汀陽所說的以中原為聚點，有強大向心力的漩渦式逐鹿中原，是一個假



象；或者，可以說，是單一固定視角所看到的片面歷史運動。趙汀陽以「變－在」（becoming）作為存在論，而不是存在本體（being）。他強調中國存在之本在於其「變在」之方法論：「一直保持屬於中國自身之『今』的歷史時態，中國也因此仍然是中國」。（趙汀陽 2016c，重點為筆者所加）

這個弔詭的論證，實際上指出了相反的事實：「中國」時時刻刻在變，也一直不是同樣的「國」或是「天下」。「中國」非「一」。「中國」是複數的。此「一」並非彼「一」。「中國」的名稱，只是眾多王國以主觀位置佔據「天下」而自我宣稱的地理空間，而非性質上的同一。

趙汀陽強調「仍然是中國」的意圖，是對於「一」的堅持，以「一」統「天下」，否認「多」的存在，並且要以「一」遮蔽「多」，以「一」壓抑「不同」；簡言之，這是企圖以儒教「天下」作為「一」的理據，以仁義道德之名，區辨名分地位，確立「華」的文化優越性與核心地位，而執行擴張天下的統治。

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因「變」而「在」的政體，其實都是不同主觀立場以及不同形式的「中國」或是「我朝」。雖然沿用了前朝體制，卻都是不同的「國」或是「王朝」，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定義「天下」，以致於沒有一個「國」可以自稱所有不同的「中國」皆歸屬於己，或因歷代不同的複數「中國」而證成自身獨一而千年不變的完整主權。

### 三、「天下」的變化曲線與及其殖民性格

#### （一）「天下」的政治神學以及「宅」的遷移與視角的擴張

「天下」作為「理念」，忽略了「天子受天命居中國治天下」的皇帝制在歷史過程中的物質性實踐，以及此實踐具體呈現於併吞、征服、殲滅、強迫同化的武力暴力與制度暴力。

甘懷真在《天下的誕生：巫教、上帝與儒教國家》（2024）以及《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2022）等著作中，透過巫教、禮儀以及儒教經典詮釋，對於「天下」提出了相當具有說服力的說明。「天」的宗教制度成立於商代，約西元前十三世紀之後，商是中原王權的共主，佔據河南、河北南部與山東西部。「天」衍生出天下、天子、天命、天理。漢儒要恢復周禮，

而建立了郊祀禮，祭祀昊天上帝。天下的範圍是中原王權的範圍。穩固這種中央集權的皇帝制論述，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最具有代表性。《春秋繁露》提出了名分論的宇宙觀。宇宙間有諸神、萬物與萬民，各有其「名號」，佔據宇宙中的一個固定的位置，其範圍是「分」。天子是「天之子」。天與天子之間，存在著「孝」的關係，由天子執行的祭祀所維繫。郊祀禮的成立，標示了宗教國家的成立。從漢到清，中國不同政權都祭祀一位上帝。當然，這個「天」也會被其他宗教接納，例如北魏以佛教為國家宗教，而天子是護持佛法的聖王。南朝或是其他外族建立的各王國亦是如此（甘懷真 2022 [2012], 2024）。

甘懷真認為一般人對於天下概念存有誤解。他解釋皇帝宣稱「治天下」，並不是要征服並治理全世界。但是，有別於甘懷真的論點，本文強調，「天下」是一個治國者的視野，也是一套合理化自身統治地位的修辭。「天下」作為政治神學的論述基礎，天子為天命所歸，受天命而統天下，以「天下」為尺度，超越於氏族集團或是不同部落所建立的城邦國家，其實正是以主觀位置的視角與尺度，將所有天底下的世界，納入治理範疇，並建立儒教所提供的「名」與「法」，區分「分位」，建立天下秩序。平天下者，透過土地佔取、倫理規範、禮儀教化、科舉考試以及官僚體制，輔佐以思想控制、懲處悖逆、不敬以「刑」，而充分發揮穩定治理的技術。

中國周邊民族，包括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回紇、吐蕃、越人、氐族、羌族，以及無數消失的民族，在歷史過程中，受到中原以及周邊族群的勢力擴張影響，時常處於被征服、驅逐或是被迫同化，而承受差別待遇的殖民處境。然而，無論是漢族或是非漢族，都會挪用「天下」話語作為治理的政治神學，也都會對邊疆民族採取「內遷安置」政策，將征服的部落遷入內地，鼓勵通婚，進行同化。

實際上，無論是漢化，或是胡化，甚至越化、羌化，漫長的歷史過程是不斷融合的文化過程。但是，在武力擴張的時刻，這些同化便是強迫而殘酷的。此外，不同政權所奪取的天下，總是挪用已經被體制化的天子之位以及其官僚行政體系，以便宣稱正統。除了唐宋各朝之外，《金史》金哀宗詔曰：「南渡二十年，所載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腦以養軍。今兵至不能逆戰，止以自護，京城縱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與亡有天命，惟

不負吾民可也。」（托克托 n.d.）《元史》武宗詔曰：「惟我國家，以武功定天下，文德懷遠人。」（宋廉 n.d.）《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記載：「我之興兵，非欲取中原得天下也。因遼東官員不行正直之道，貪瀆貨賄，罔顧是非。」「匹夫有大德，可爲天子。天子若無德，可爲獨夫。」（覺羅勒德洪等 n.d.）《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記載：「公四海之利爲利，一天下之心爲心。」（Anonymous n.d.）《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記載：「朕爲天下共主卷知。凡各部民人，皆欲令其安生，並無彼此異視之意。果事屬兩便，朕無不允。」（Anonymous n.d.）這些異族皇帝一旦以天子自居，便以天下爲己任。

不同的天下，以不同的主觀位置佔據，並以種族化的階序區分了人民，進行差別化的治理模式，甚至執行思想控制與文字獄，以便穩定局勢。不同王朝與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策略。以種族化治理爲例，元朝推行「四等人制」，將全國居民按照族群分爲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蒙古人享有最高政治法律特權，色目人、漢人次之，南人最低。這些階層也體現在官職分配、法律量刑、賦役徵收等層面。清朝分滿族與漢族，同樣在政治權力、教育、仕途、司法與居住上，都有差別待遇。然而，清朝滿人政權仍然以「華」自稱，乾隆帝在征服西域，殲滅準格爾汗國，將邊疆化爲內地，成爲「新疆」，並頒賜準部《時憲書》時親作詩曰：「伊犁哈薩克，從此入華編。」（葉高樹 2024）

葛兆光在《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中提出了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的說法。雖然中國的空間邊緣比較模糊和移動，也陸續出現各種挑戰中國同一性與中華文明延續數千年的史觀，葛兆光仍舊堅持中國是一個具有明確邊界、明確領土，並且擁有深入而普遍的同性生活倫理。葛兆光指出，雖然歷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間邊界常常會變化，從唐宋以來一直「由國家、中央菁英和仕紳三方面合力推動的儒家（理學）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識化，使得來自儒家倫理的文明意識從城市擴展到鄉村、從中心擴展到邊緣、從上層擴展到下層，使中國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因此，在文化意義上來說，「中國」是一個相當穩定的「文化共同體」（葛兆光 2011: 25-33）。在《何爲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葛兆光繼續強調一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始終具有延續性以及高度同一性的「中國」，雖然是一個「移動的」中國，也面對多方不同史觀的質疑，但是，葛兆光仍舊堅持「中國」

是一個穩定的「文化共同體」，不容輕易解構。（葛兆光 2014: 1-32）

汪暉（2025）在《多重世紀時間：帝國、革命與跨體系運動》中提出提出「多重世紀時間」與「跨體系社會」，來解釋中國與周邊民族的關係。他試圖對抗西方現代性的單線時間觀，而強調不同歷史節奏的橫向交織與體系之間的相互滲透。在汪暉的詮釋框架中，「世紀」標誌著一種全球同步性的出現，但此同步性內部始終由多重時間性構成；中國歷史亦被理解為處於帝國、民族國家與區域秩序交錯之中的長時段生成，而非封閉的國族敘事。此一觀點鬆動了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歷史理解，並將西域、西藏、蒙古、臺灣等邊疆轉化為動態界面，而非被動邊陲。

然而，在汪暉這種「跨體系」的流動敘事中，帝國權力的暴力基礎被抽象化為體系互動的結果；屠殺、強制同化、語言與宗教的抹除，不再構成分析的核心，而被稀釋為歷史過程中的「交織」與「重組」。跨體系社會消解了帝國與民族國家的界線，卻同時遮蔽了支撐這些連結的權力不對稱，使帝國擴張在理論上被去暴力化與去責任化。對照之下，「天下」不僅是倫理想像或秩序理念，更是一種持續推動領土吞併與人口重組的治理衝動，其歷史運作深植於殖民制度的生成與種族化階序的鞏固。若不正視這一殖民性底層，所謂「多重時間」終將淪為一種和諧敘事：在時間的共在之下，漫長的時間過程被抹除，不同時間的苦難也被掩蓋而消音。真正回到歷史的解殖分析，必須重新將暴力、不對稱與被抹除的時間性置於理論核心，而非將其吸納為體系之間的中性流動。

趙汀陽的「漩渦理論」與「變一在」存有論所說明的「中國／天下／帝國」的論點，葛兆光承認歷史中移動但是維持穩定「文化共同體」的「中國」，以及汪暉的「多重世紀時間」與「跨體系社會」，正如眾多強調中國歷代穩定延續的學者一般，避重就輕地肯定了以「天下」為己任，並且具有文明「同一性」的中國，而輕輕放下在這個漫長歷史過程中多重漩渦運動所造成的邊界「移動」效果，一次又一次的征服、屠殺、殲滅異族、強行移民實邊，進而編戶齊民強迫同化的殖民手段。這種殖民認識論的無意識操作，不僅遮蔽了歷史過程的暴力，更賦予了其正當性。

回到歷史，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歷史中移動的「天下」，移動的「中國」，是在不同的氏族權力集團或是異族鄰邦掌握政權之下，透過軍事擴張，

征服他族，納入版圖。無論是遷徙本族人口填補新征服的邊疆地區，或是強迫遷移外族人口進入內地，以便進行同化，這個變遷的歷史過程，都正是土地掠奪與領土擴張的動態地形變遷史，也是典型的帝國擴張與殖民模式。

我們可以說，「天下」視角的膨脹擴張，是受到了權力擴張的驅動，並且具有征服性與殖民性。「天下」的視野背後，是權力位置的立足點，展現了氏族集團以及邊疆族群的擴張或是收服鄰邦的野心與抱負。每一次的邊界遷移，都是具體的殘酷行動。中國史就在漢族擴張收縮以及其他族群相互傾軋之間，在世界史發展的總的傾向之間，展開了其伸縮變化的曲線。「宅茲中國」的「宅」與「中國」，標記著無法化約的死亡地形學。

杜正勝（2023）於 2023 年出版的一本有意思的小書《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的速寫》，也提出了「何謂中國」這個問題。杜正勝指出，周初銅器何尊銘文所記：「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乂）民。」乂，意指治理，或，則是由口與戈組成，意指周武王以武力攻克殷商，成為共主而建都所在之地，也就是成周，今日洛陽。其他古籍所指「中國」，也指周王直接統治區域，而不包含眾邦的天下。「中國」所在的位置以及區分的內外，隨著朝代的更替而遷徙，天下秩序也隨之更迭。中國的「天下秩序」很清楚地顯示於史書中的四裔論述、五服制以及王會篇、職貢圖等古籍中。二十五史中，除了司馬遷的《史記》以匈奴、南越、東越、朝鮮、大宛等國名作列傳，西南的部落酋邦則以「西南夷」稱之，其餘各朝史書，則依循著夷夏之別，以東夷、北狄、南蠻、西南夷等稱之（杜正勝 2023）。這種天下秩序以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之五服制，並且規範其職掌的祭、祀、享、貢、王等不同任務，區別獻祭、進貢異物或是奉周為王等不同位階。<sup>4</sup>

杜正勝在小書結尾處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的天下觀以及各朝正史對於「四裔」的記載，展現出了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沒有與列國平起平坐的世界觀。當前中國崛起「一帶一路」的佈局，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號召中，是否仍舊可以「嗅聞到『五服』、『王會』和『職貢』的氣息呢？」這種古典的「基因」，當前以什麼形式出現呢？

4 《逸周書 王會篇》描繪了四裔進貢的場面，內臺是「中國」，也就是華夏諸邦，外臺之外則是四裔。各朝代不同版本的《職貢圖》，則以圖像紀錄了當時蕃客入朝進貢的景象。以 1818 年的朝貢圖所顯示，進貢的國家包括朝鮮、琉球、安南、老撾、暹羅、蘇祿、緬甸、荷蘭等。



天下共生的悖論：何謂「天下」？天下之「餘」在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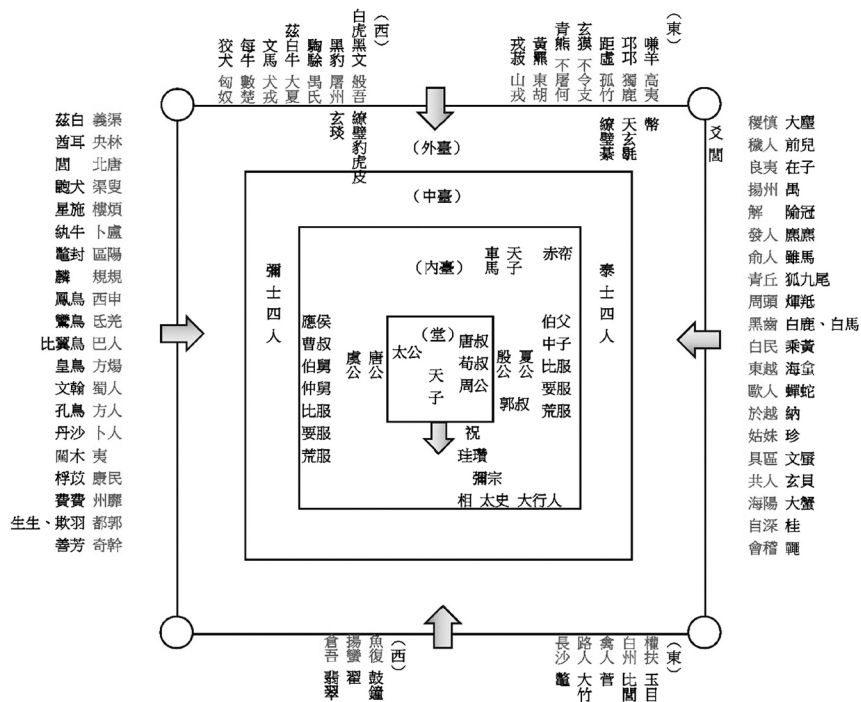


圖 5 王會篇的天下藍圖，杜正勝根據《逸周書 王會篇》繪製（杜正勝 2023）

杜正勝跳躍式地拋出這些問題，其實是在間接地回應當代學者念茲在茲而試圖介入「何謂中國」的問題。本文在分析「中國」非「一」的論點同時，也要提出另外一種問法：「天下」的變化曲線如何展現了其殖民性格？中華帝國的歷史，是否就是一個不斷遞嬗的殖民歷史？這個殖民歷史如何透過儒法並用而兵武相隨的治理術，穩定其政權？這種天下秩序的論述，為何在 21 世紀復出？如何透過物質條件與地緣政治，建立起其物質基礎建設？

## （二）天下擴張的殖民性格

在檢討殖民主義的學術歷史中，中國從來沒有被放入視角之內。論者多半指出，中國從來沒有被殖民，或者頂多被描述為被資本主義帝國擴張而半殖民社會，因此也不會涉入後殖民論述。

何謂「殖民」？「殖民」意指一個國家以強制的管理模式，控制殖民地的人民以及地區資源，從而獲利，並使這個地區的人民沒有自主決定的權利。奧

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1997）的《殖民主義：理論概論》（*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雖然簡要，卻已經提供了具體的定義：殖民主義是多數原住民與少數外來侵略者之間的關係。遠方首府的殖民者決定了影響殖民地人民生活的各種決策，並且堅信自己的文化優於被殖民者的文化，也因此賦予自己治理這塊土地的必要性。「Colony」最早是指羅馬帝國時期所用的詞彙，意指在荒地移民墾植的農地，亦指帝國征服之領土的貿易或是軍事的前哨基地。當前學術界所研究的殖民歷史，通常是指西歐國家結合了資本主義的帝國擴張。到了 1914 年，被西歐國家佔領的殖民地已經高到全球 84% 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大部分的殖民地則展開了大規模的去殖民運動，而成為獨立國家。

西方學界也發展了大量檢討內部殖民的研究。「內部殖民」的概念最早是由巴勃羅 岡薩雷斯 卡薩諾瓦（Pablo González Casanova）、安德烈 岡德法蘭克（André Gunder Frank）、哈羅德 沃爾普（Harold Wolpe）、麥可 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等人的研究先後提出。這些學者討論南非、南美、南歐等地區在殖民時期結束之後，在世界經濟體系結構下，出現了區域內部不平等發展的內部殖民問題（González Casanova 1965; Frank 1969; Wolpe 1975; Hechter 1975）。尤根 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也曾經討論過體制性與系統性的「內部殖民」。哈伯馬斯指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功能理性高度發展，過度依賴經濟制度以及國家管理，以致於機構化與自動化的官僚系統反轉過來，使生命世界邊緣化，也使得人在社會中被系統性地物化與片面化，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哈伯馬斯以系統性「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zation）來描述這個現象；一部分的人佔據權力集中的位置，分配資源，而另一部分的人民卻無法自主與平等地參與社會（Habermas 1987: 305, 318, 327-331）。

以結構層面來看，哈伯馬斯所指出的「內部殖民」，除了涉及國家內部社會體制性操作而造成內部邊界分化與排除，也涉及了觀念結構與知識形態的問題，更靠近本文的關懷所在。不過，本文要探討的問題並不僅限於西方殖民歷史或是後殖民地地區的社會結構，也不只是區域內不同社會的不平等發展，而希望凸顯這種不平等發展的社會體制如何在同一個社會發生，以及如何被系統性的知識型所支撐，尤其是在以儒教仁義道德與王道宣稱的中華帝

國歷史中發生。<sup>5</sup>

本文轉換視角，將中國的歷史也納入殖民歷史來思考。中國歷史中不同氏族王朝對於鄰邦或是邊疆部族領土的佔領、併吞、同化，以及以儒教政治神學的等差秩序進行差別治理，正是帝國擴張與殖民治理的過程。

當前學界也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探討中國崛起的態勢，是否是「中國主導的和平秩序」（*pax Sinica*）時代的再度來臨？中國對非洲的開拓，是否是新殖民主義式的資源榨取？<sup>6</sup>針對這些分析與預測，尤其是其中帶有中國威脅論的口吻，捍衛中國的學者紛紛出面辯護。代表性學者之一的熊玠（James C. Hsiung）指出，中國在 16 世紀以前已經經歷了超過一千年的中國盛世，並沒有像是 16 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所展開的帝國擴張與殖民統治。21 世紀再次復出，也不會發展出這種帝國模式。熊玠並且以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以及金融風暴後快速恢復經濟力，說明這些受到儒家傳統影響的亞洲國家有其特殊的儒家社會結構。熊玠更強調，以中國帶領的治理系統有特殊的中國美德與價值，或是儒教資本主義，其特色在於形式上的等差關係之下有非形式的平等，恰恰不同於西方社會中的形式平等之下卻又非形式性的等差關係（Hsiung 2002, 2012）。

熊玠以及其他漢學家所發展「中國模式」的系統論，凸顯了傳統天下觀以及朝貢體系的儒家倫理與尊卑等差所維繫的和平關係。這種以不平等作為平等的修辭，被當代諸多歷史學者所批評。代表性學者例如濮德培（Peter Perdue）、迪宇宙（Nicola Di Cosmo）、勞拉·霍斯特勒（Laura Hostetler）、米華健（James Millward）等人，他們從內亞以及西南部少數民族觀點，重新審視大清帝國對於西部擴張版圖的殖民歷史。這些學者指出，清朝歷經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兩百年的征戰，殲滅準格爾，兼併西藏、新疆、蒙古、青海、外東北、四川、貴州、安南等地，並且移民實邊，駐兵屯田，改土歸流，實際上是典型的帝國殖民擴張的操作（Di Cosmo 1998; Hostetler 2001; Millward 2024; Perdue 2010）。

濮德培（Perdue 2010; 2021）指出，漢唐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在長城之外屯

5 本人曾經在〈知識型的符號混成與內部殖民〉一文中討論過此問題，見（劉紀蕙 2017）。

6 可參見（Jörn Dosch 2007; Liu 2019）。

兵，佔領土地。明代朱元璋也實行軍事殖民，擴張領土。清朝康熙皇帝積極透過屯兵屯田，除了每一個屯田區駐紮 4000 至 5000 名士兵之外，執行農業移民，契約勞役，鼓勵開發商業，更將罪犯流放到邊疆充軍墾荒，甚至擄掠流民，強迫遷移到邊疆。清代康熙到乾隆年間，平定新疆、蒙古，將四川、貴州改土歸流，下令編撰《四庫全書》，制定《天下古今輿地圖》，《職貢圖》、《萬國來朝圖》，確立了大清正統的歷史以及天下的格局。

迪宇宙 (Di Cosmo 1998) 也指出，大清的歷史敘述與天下版圖，成為了日後現代中國的國族認同基礎。大清領土擴張，殲滅準格爾，併吞內亞，以內地控制殖民地，完全顯現出與歐洲殖民國家如出一徹的模式。十七世紀設立的理藩院，便是專門處理外藩事務的機構，通常翻譯為「殖民事務院」(court of colonial affairs, colonial office) (ibid.: 294)。理藩院的前身是「蒙古衙門」，管理不在八旗之內的蒙古。崇德三年 (即西元 1639 年) 改為理藩院，管理地區除了蒙古之外，也包括與俄國的外交事務，外蒙古，以及陸續攻佔的青海 (庫庫淖爾)、西藏、新疆 (準格爾汗國)，以及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事務。這些地區被清朝視為外藩，通過中央機構對邊緣地區進行統治，實施嚴格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管理與控制，顯然具有殖民治理的性質。

勞拉 霍斯特勒 (Hostetler 2001) 直接指出，17 世紀到 18 世紀兩百年間，大清帝國以殖民方式佔領貴州，驅逐並且強迫同化原住民。18 世紀替康熙皇帝制定編修地圖的耶穌會教士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 與費隱 (Giovanni Gherardini Fridelli) 以中國的「殖民地」描寫貴州 (ibid.: 102)。米華健 (Millward 2024) 在研究歐亞十字路口的新疆如何被大清帝國以「朝貢體系」與「漢化」的修辭，遮蔽了其抹除邊疆少數民族多樣性的「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 手段時，指出中國學者宣稱中國從來沒有侵略外族，沒有殖民其他國家，僅透過漢化而維持高下位階的和平關係，實際上無視於「中國」無數次擴張領土，佔領非漢族的土地，也無視於長時期在這片土地上多國並存的時期，以至於「中國」僅成為去歷史化的空洞能指 (Millward 2024)。

從 17 世紀到 18 世紀，清朝陸續將西藏、蒙古與新疆納入版圖。康熙、雍正、乾隆在歐洲傳教士的協助下，進行全國土地測量，並繪製出康熙《皇輿全覽圖》、雍正《十排皇輿圖》、《乾隆內府輿圖》。流傳最廣的《大清萬年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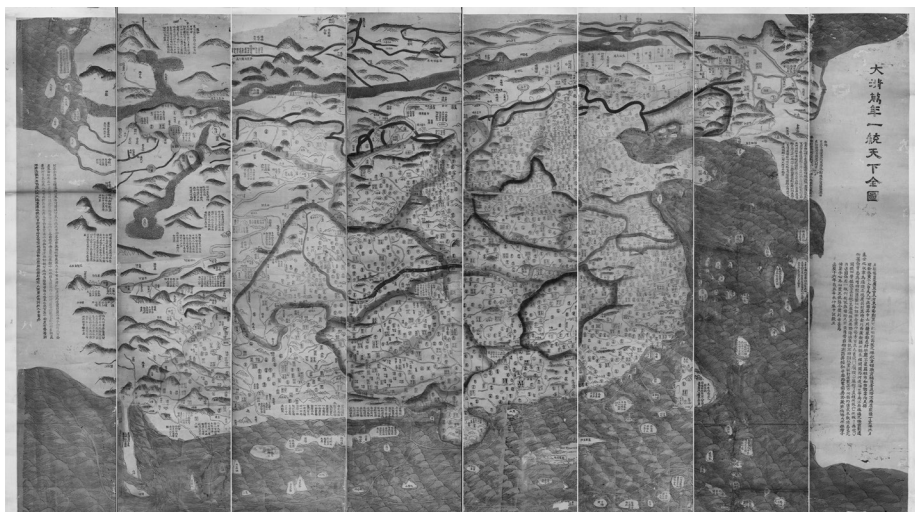


圖 6 乾隆三十二年（1767）繪製的《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 1930）

統天下全圖》，是由黃宗羲之孫黃千人（1694-1771）所繪製。黃千人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將黃宗羲舊刻輿圖重訂為《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具體展現了乾隆皇帝的天下視野。全圖東起朝鮮半島，西至蔥嶺，北達黑龍江，南抵南海諸島。除了清代內政地區、疆域版圖、行政建置之外，另標住處蔥嶺、大西洋、俄羅斯、身毒國（印度）、暹羅、日本、朝鮮等。（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 1930）

新清史學者著重於大清對於東北、西北、西南等邊疆地區的擴張。但是，從歷史來說，兩漢、唐、宋、元、明各朝代都以藩屬關係建立了天下的秩序，基本上也都是具有殖民擴張的性質。<sup>7</sup>關於「中國」與「四夷」的殖民關係，杜正勝（2023）指出，周人時外來的征服者，要東進殖民樞紐的衛國。拜周公東征之賜，大東、小東是早期周人東進殖民成果豐碩的地區，衛、齊、魯三點為核心，西連成周，建立城邦聯盟，並向外擴張。編戶齊民，是秦滅六國之後，從周代城邦而轉向帝國政治的體系創制。中央控制地方的戶口和土地，納入版

7 周代指九州之外的國家為夷服、鎮服、蕃服。所謂「番」，是指古代王畿之外的遠方之國，獸足謂之番，後來以藩屬國稱呼王朝分封的諸侯國以及臣服的屬國。兩漢時期安置歸附的藩屬，包括匈奴、羌、夷等少數民族。歷史中的藩屬國包括朝鮮（高麗）、琉球、越南、南掌（寮國）、暹羅（泰國）、緬甸、廓爾喀（尼泊爾）、蘇祿（菲律賓），以及還有位於巴基斯坦的坎巨提，位於俄羅斯的浩罕、布魯特，位於烏茲別克斯坦的安集延、瑪爾格朗、塔什干，以及阿富汗、不丹、錫金（印度）。



圖，編戶齊民。帝國之下的齊民耕田納糧，提供徭役，接受徵調，服兵役，以便保衛政權，正是中國帝國擴張與殖民的治理模式。除了邦內的甸服之外，其他各「服」都只是帝國以「羈縻」之術對待「非我族類」，控制其勢力範圍，例如西南與東北地區。

此外，從歷史紀錄可以得知，通往西域的絲路，並不只是貿易通商而已。絲路具有戰略部署的功能。漢帝國開拓了絲路，設置西域都護，任務是護道，監管並控制天山南北兩條道路，聯繫中國本土到中亞、西亞的交通。路上並設置烽燧，派兵守衛監控，並且執行屯田屯兵制度，以便糧食自給自足，甚至可以徵召西域諸國兵卒，「以夷狄攻夷狄」。唐朝更在關內、河北、隴右、劍南、江南、嶺南諸道設府州，任用當地本族人執行實際治理，「用其酋渠為都督、刺史、縣令」。元代實施土司土官制度，也是同樣的原理。這就是所謂的「間接治理」，高度自治，要納貢與服徭役，但是不需繳納賦稅（杜正勝 2023）。

殖民治理的具體策略，可以從康熙雍正年間四川總督年羹堯施行的屯田屯兵制度，作為最具有代表性的殖民治理操作。年羹堯奏摺的十三條政策，說明了清朝如何將蒙古部族所統治的自治領地變成清朝的永久領土，也展現了濮德培（Perdue 2010）所說的「向外極大擴張後維繫帝國的張力」。年羹堯的十三條政策奏摺內容條如下：「一、給青海和碩特人定罪論功行賞，二、青海入旗劃定居地，三、訂定朝貢儀式與貿易章程，四、分居於青海的喀爾喀人為一部落，五、向青海西番徵稅，招撫藏番，六、免去達賴喇嘛前往青海貿易的鞍子錢，另定每年恩賜額度，七、制訂青海寺廟喇嘛制度和數量，八、構築西寧到甘州、卜隆吉的新邊與重劃賀蘭山南山北邊界，九、增添新邊的鎮營兵馬以為彈壓，十、四川松潘、打箭爐添設鎮營與武官兵數，令松潘周邊土番村寨為屏障，十一、歸併裁汰鎮營，修改各營馬兵步兵戰守兵等數額，十二、令直省山東犯人至西寧新邊與卜隆吉開墾，所收糧草充當地軍餉，十三、移提督岳鍾琪留守西寧、松潘鎮臣周瑛撤回理塘駐守，持續招撫番民。」（陳怡文 2023）上述措施具體說明了擴張領土、佔據青海、移民實邊、切斷外族宗教權力、編戶齊民，並將自治地區改為直接統治的殖民治理模式。

1723 年，雍正鎮壓庫庫淖爾（今青海）之後，庫庫淖爾的喀爾喀蒙古人被編入不同旗制之下，不再從屬於和碩特人，青海這塊領土成為「內地」的一

部分，當地藏「番」將由清朝駐軍監督的土司治理，他們與達賴喇嘛的關係被切斷。1726 至 1727 年，川藏交界地區被劃歸為四川。1747 年（乾隆 12 年）到約 1774 至 1776 年間（乾隆 39-43 年），兩次大小金川戰役之後，四川西部完全納入中央直接統治。1755 年（乾隆 20 年）清軍攻滅準格爾汗國，1759 年平定大小和卓，天山南北路，也就是今日的新疆，全部被納入清朝版圖。準格爾被滅國，西藏地區也被納入清朝版圖，進行直接管理。雲南貴州等地，也在十八世紀中期乾隆年間的「改土歸流」政策之下，逐步廢除土司，設立流官，以中央控制。在西部進行一系列軍事征服的期間，乾隆皇帝於 1757 年開始整頓已經逐漸有名無實的保甲制度，頒行「更定十五條」保甲法令，明確保、甲、牌各層級的執掌範圍，強化對地方官員的問責，推廣循環冊，監控流動人口。在「化邊疆為內地」的戰爭期間，保甲政策一則強調人口流動的管理，再則要將邊疆人口編戶入籍，便於管理。（葉高樹 2024）

建立天下秩序的過程中，軍事征服與人口管理的密切關聯，昭然若揭。

### （三）儒法並用、輔之以刑的天下治理技術

擴張之後的天下，要如何維繫其穩定的秩序呢？我們注意到，其實中國的儒教政治神學所使用的天下觀，並不只是儒表法裡或是陽儒陰法，而是君主集權而儒法並用且輔之以「刑」的治理術與物質部署。

從漢武帝以及董仲舒開啓的「禮制」，是執行儒教政治神學並且穩固天下等差秩序的治理術核心。大幅擴張領土的清朝，同樣以「禮制」來強化其治理統治技術。禮制結合保甲制度的基層管理以及鄉里宗祠的教化規約，再加上科舉考試以及文字獄的施行，完成了一整套的治理技術。

清朝以外族統治中國，從順治開始，就延續宋代制度，奠定孔子為「衍聖公」，舉行祭孔大典。康熙並延請學者進宮內廷講解儒家典籍；雍正頒定《聖諭廣訓》，皆是四書五經的精義；乾隆同樣重視孔孟儒家之學，曾經九次到曲阜祭孔，並特別重視聖祖康熙的《日講禮記解義》，以朱熹的《三禮》為要，包含對政統、正統、治統的延續與繼承，以及對學統的強調。<sup>8</sup>在「禮」的基礎

8 《日講禮記解義》是康熙帝在經筵所講的經文內容。雖然早年沒有刊印，但是有經過康熙帝御訂。乾隆帝十四年下令校對刊印，為武英殿刊本，表示這本書是皇帝自己特別看重。日後又收在四庫全書中。

之上，經天地，理人倫，定尊卑，殊萬物，君臣、夫婦、父子、兄弟，皆有序有節，正是所謂修身、齊家、治國而平天下的王道。這個等級秩序清楚區分，各有其位，不得僭越，不可犯上，更不可懷疑君主所制定的法規。清朝內閣禮部負責各種禮儀典章制度，在各州各縣開設各級學校，並以四書五經，尤其是朱熹的《三禮》，作為科舉考試的依據，以此選才，擴充官僚體制。禮部雖然負責國家禮儀、教育、外交等事務，卻不負責書籍編纂出版。重要的典籍，例如《禮記》、《欽定大清通禮》、《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以及《四庫全書》的編纂，都是奉敕纂或是奉敕編修，也就是皇帝下令組成特別的小單位，專門負責從撰寫到校對刊印的過程。

奠基於鄉里的保甲制度，是一種最基層的維安治理。十戶一甲，十甲一保。某一戶犯法，則整個甲或保的居民都會受罰。保甲制度可以追溯到商鞅變法，編什伍，施行連坐制，是一種將軍事管理運用在民間基層戶口管理的制度。北宋王安石變法，制定保甲法，開始了嚴密的組織結構，以維護治安、查舉犯罪為主要目的，加上武裝動員以及連坐法，來落實刑事責任。明太祖洪武十四年，也開始透過里甲組織管理戶口，並且制定嚴厲的邊境管制，不得私自出海。明代中葉，福建沿海地區倭亂嚴重，內地礦區也是常有礦徒聚眾對抗官府。嘉靖年間開始奏請推行保甲法，一則以確實的戶口制度杜絕流民流寇，再則以武裝動員民間力量，對抗盜匪。萬曆年間，保甲制度出了冊籍記錄之外，也加上了連坐法，並結合鄉約，加強鄉里組織的權力（薛理禹 2019）。

鄉里教化與宗祠制度，強化了清朝延續自明朝的保甲制度。雍正朝所制定的保甲條例，使得保甲制度不僅只是輔助性的戶籍編制，而在鄉里宗祠的組織基礎之上，積極管理治安，控制人民，以「弭盜、摘發、守御」（常建華 2013）。雍正帝重視鄉里教化，將《聖諭廣訓》頒布全國，系統性闡述康熙的《上諭十六條》。如程頤所言：「管攝天下之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心不忘本，須是明譜系，立宗法也。」族規以三綱五常為基礎，規範全族思想行為，不得犯上，必須謹守分際（林存陽 2010a, 2010b）。鄉里教化與宗祠制度結合保甲制度，強調以「孝」治天下，以孝悌人倫為準則與規範維繫一族人心，地方宗族為治理單位，加上保甲制度的穩固，正可以全面收編。

清初數朝除了編輯典籍，設置學校，頒布通禮，進行科舉考試，加強鄉

里宗祠約束之外，從康熙、雍正到乾隆時期也持續進行了文字獄。清朝 268 年內，有兩百多起文字獄。順治時期的明史案持續到康熙，前後延續 16 年，牽連兩千多人。十八位直接參與修訂的人中，十七人被凌遲處死，已死者則被發冢開棺，斷頭戮屍。康熙時期的《南山集》以及雍正時期的「查嗣庭試題案」與「呂留良案」，已經透露出各種被舉報為「悖逆」、「不敬」的罪名，多半是挾怨報復而羅織罪名，但是輕則杖責流放，重則誅殺，甚至牽連九族。乾隆時期文字獄最為頻繁，也最為嚴酷，銷毀書籍共約一萬一千多部，銷毀書版達八萬塊，涉及三千種圖書，案例遍佈二十多個省份，成為全國性的現象（金性堯 1989; 尹金欣 2011）。清朝文字獄期間，組織嚴密的保甲制度與連坐法，更高度發揮了思想控制與監控異議份子的作用。禮部頒定法規，刑部執行懲罰。明代的酷刑種類繁多，包括凌遲、梟首、斷手、刖足、去膝蓋、閹割、剝指、剝趾、抽腸等，在清朝也全面沿用，甚至在雍正與乾隆時期更為嚴酷（張運明、王瑞 2008）。

儒表法裡或陽儒陰法的說法，並未觸及真相。歷朝歷代延續的儒教治理技術以及其物質性的全國部署，讓我們看到儒法並用並輔之以刑的管理，並且越是講求禮法，越見其殘酷嚴苛的體制。

#### （四）天下征戰的殘酷地形學

中國歷代的南征北伐，造成無數鄰族鄰邦或是邊疆民族的滅亡。在不同部落集團相互征戰，或是帝國擴張時期，邊界的移動總是造成動則數十萬人的死亡。這個變化曲線也代表了疆域變遷的殘酷地形圖。<sup>9</sup>

揚雄在《長楊賦》中描述：

嚮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

9 本人參考巴禮巴（Étienne Balibar 2004）在〈殘酷地形學大綱：全球暴力時代的公民身分與文明性〉（“Outline of a Topography of Cruelty: Citizenship and Civility in the Era of Global Violence”）所提出的概念，轉而討論中華帝國歷代天下疆域的變遷，標誌了殖民擴張的殘酷地形圖。在〈殘酷地形學大綱：全球暴力時代的公民身分與文明性〉這篇文章中，巴禮巴討論「文明性」（civility）這個充滿曖昧的詞彙。當巴禮巴分析全球化以及「文明性政治」之「殘酷」地形學時，他指的是系統性、經濟結構或是道德意識形態的暴力。在各種歷史過程以及當前地緣政治之下，「文明性政治」造成了南／北、核心／邊緣、邊界內外的殘酷地形分佈，讓我們不斷看到特定地區似乎注定了貧窮、戰爭、死亡的命運，也看到在社區鄰居之間以公民邏輯為原則的種族隔離與邊界劃分。亦可參考劉紀蕙〈佛洛伊德、巴禮巴與「文明性」的悖論：政治拓撲學的難題〉一文對此的進一步分析（劉紀蕙 2024: 11-41）。

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沅沸渭，雲合電發，森騰波流，機駭蜂軼，疾如奔星，擊如雷霆。……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獍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躡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並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浮沉，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霑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揚雄 n.d.）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揚雄筆下的「朝廷純仁」、「尊道顯義」、「聖風雲靡」，顯然就是中國歷代文人所慣用的修辭位置。然而，這種「王道」與「普天所覆，莫不霑濡」的代價，就是在漢武帝五十四年在位期間，打了三十多年的仗，「海內虛耗，人口減半」。衛青七次遠征匈奴，斬獲五萬餘人。魏去病六次出擊匈奴，斬獲十一萬餘人。南越、東越、西南夷、朝鮮等地的征服，同樣也是始於征戰，終於土地佔取兼併，移民屯田，設郡屯卒。漢代邊疆族群不是被強迫驅離，就是被同化，例如大月氏、匈奴、越、苗、傣（李唐 1979: 37-64）。

漢武帝加強中央皇權對於地方王侯的控制，借重董仲舒所提出的大一統思想，獨尊儒術，加強教化，設立太學，廢百家之書，執行重稅，鹽鐵專賣，均輸平準，貨幣統一，土地兼併。凡此種種治理技術，使得漢武帝時期，權力全面集中於中央。除此之外，漢武帝時期北伐匈奴，西通西域，東討朝鮮，南定百越，平定西南夷，征服西羌，使得漢代疆域擴張到當時史無前例的地步（李唐 1979; 范文瀾 2009）。

翦伯贊（2008a: 175）的《中國史綱》第二卷《秦漢史》中，評論漢武帝當時「簡直在戰爭中瘋狂了」。這並不是誇張之詞。只要看一下歷代戰爭中屠殺的人數，便可以一探這種瘋狂的程度。西元前 260 年戰國時期秦軍將領白起在長平指揮士兵屠殺四十萬趙國戰俘（司馬光 n.d.: 卷五）。<sup>10</sup> 五胡十六國時期，魏平帝冉敏於西元 350 年發動後趙漢人屠殺胡人，無分貴賤男女老少，死者超過二十萬人（ibid.）。西元 395 年北魏軍在參合陂之戰擊敗後燕，屠殺降

10 雖然有司馬光《資治通鑑》的記載，但是，關於長平之戰的死亡人數先有朱熹，後有錢穆提出質疑。無論如何，趙軍被殲滅或是降伏後被坑殺，都是事實，也有民間傳說以及考古遺址證實。



兵四、五萬人（ibid.: 卷一百零八）。西元 878 年唐末民變領袖王仙芝軍隊焚燒掠殺江陵城十萬戶，將近四十萬人死亡（ibid.）。西元 879 年，黃巢軍屠殺廣州穆斯林人、波斯人、猶太教等近二十萬人。蒙古軍於 1211 年到 1214 年間的貞祐之亂，屠殺女真族約五百萬人（托克托 n.d.）。蒙古軍於 1225-1227 年年間屠殺西夏國黨項人約三百萬人，1227 年，西夏亡；1234 年，金亡（范文瀾 2009）。明末清初 1644-1681 年間張獻忠、吳三桂、南明軍、清軍在四川混戰，死亡人數將近上百萬人。1645 年 5 月 20 日，清軍攻佔揚州屠城十日，八十餘萬人死亡。清軍攻破嘉定、江陰、金華、同安、南昌、大同、廣州後屠城，1645 到 1650 年之間先後屠殺共約二百餘萬人以上死亡。1755 年到 1757 年間乾隆皇帝征服新疆地區準格爾部，進行滅族，約五十萬人死亡（Perdue 2010, 2021）。

這些駭人的死亡人數，僅只是眾多事例中舉其數端而已，卻已經凸顯「移動」的「天下」所同時暴露的殘酷地形的曲線。此外，這些「移動」，也不必然是在無限擴張的邊疆地區，也同時會發生於不穩定的中原地帶。不同的王朝，以自身的「天下觀」，試圖與他人的「天下」較勁，成王敗寇，而降者為奴。

中國的軍事文化一向也較少被分析。但是，迪宇宙（Di Cosmo ed. 2009）所編輯的《帝制中國的軍事文化》（*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收錄十五篇論文，探討從先秦到清代的軍事文化。唐朝的邊境國家戰爭，例如突厥與吐蕃，充分展現了軍事文化在邊境防禦與擴張的作用。明朝修建長城，發展海軍，也展現了中國在海防戰略上的努力。清朝在順治、康熙、雍正、乾隆數朝的擴張，更是抬高了兵武文化的優勢。

回到中國的歷史事實來觀察，我們也會發現殘酷的行為也並不只發生於改朝換代、南北征戰、擴張領土，而更發生於穩定朝代的內部穩定治理之技術。如前所述，在儒教禮法高度發展的中國，同時也並存著歷代極為繁複的酷刑制度、奴隸制度、徭役重稅、強佔土地、買官鬻爵、控制礦產鹽產等資源壟斷技術，在在都展現了治理的手段。這些治理術中，尤其是奴隸制度、酷刑、保甲連坐法、東廠西廠、文字獄，使得無數的流民賣身為奴或淪為流寇，異議份子無處可棲。中國各朝各代的農民起義，都是已經沒有生路，鋌而走險，無法討得公道，只好選擇叛亂一途。

循著本文思考的脈絡，自然便會出現一個根本的問題：為什麼原始暴力的殘酷，會持續出現在這個以王道、仁義、禮儀自我誇稱的中華文明之中？或者，換一種問法：為什麼需要這一套說辭以及體制，來維繫這個「天下」？為何宣稱佔有「天下」的王道帝國，本身便具有擴張與殖民的暴力性格？中國的儒教禮儀教化，是否正和西方帝國殖民過程中以基督教為名啟動的文明化過程，如出一轍？

葛兆光所強調的移動但是維持穩定的「文化共同體」，汪暉所提出的多重世紀時間與跨體系社會，趙汀陽所提出漩渦論天下體系的深層基因密碼，杜正勝所提出的天下觀相對於四裔，而展現於五服、王會和職貢的古典基因，或是許成鋼所提出「郡縣官僚制、土地皇權制以及科舉制度與意識形態控制」的制度基因（許成鋼 2024）<sup>11</sup>，何者能夠解釋中華帝國延續性的殖民性格呢？什麼是中華文明不斷復出的文化基因呢？

本文認為，「基因」並不是一個適當的解釋。我們應該從這套治理術層層覆疊的物質部署與制度結構來思考。如本文所指出，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套中華帝國具有體制性的天下論述，揉合了儒教政治神學及其物質部署，可以被不同種族挪用，也可以世代修改而更加完善。中華帝國的天下觀是一個君臨天下的視角，既是治國野心，也是合理化修辭，更是結合了儒教政治神學的一整套物質性部署。這一套以儒教為基礎的政治神學，包括從鄉里宗祠出發強調禮法與名教的教育體系，銜接郡縣官僚機構的科舉考試，透過刑律與文字獄而穩固的社會秩序，也包括從軍事征戰到朝貢冊封的文明化技術——這些技術層層建立了多重牽動而全面控制的禮教名分社會。

我曾經指出：「中文世界以禮節來維繫並穩定人際之間的相對關係，以名分來界定每個人應守的位置，進而以儀式來強化身體性的記憶，恰恰落入了黑格爾所展開的文明性政治以及巴禮巴所說的文明性霸權策略：以倫理與常態規範建立公民責任；文明禮儀的維穩表象之下，則隱藏著不同形態的殘酷暴力。」（劉紀蕙 2024: 37）當文明性（civility）成為了政治，意味著禮貌、禮儀、客

11 許成鋼（2024）曾經在《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一書中，指出中國極權主義制度的三位一體，也就是郡縣官僚制、土地皇權制以及科舉制度與意識形態控制。這個三位一體的制度，構成了不斷延續的制度基因，更嫁接了蘇聯極權統治的體系，而在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繼續革命」，而穩固了區管式極權制。

氣等文明規範，都是爲了達到共同體對於常態、行爲、思想、判斷、道德的共識而執行的政治操作。循著這個過程，文明性政治完成封閉性的想像認同模式。透過禮儀教化與倫理規範，加上身分認同與公民政治，這種文明性政治操作可以執行各種形態的邊界政治與排除機制。然而，這種透過機構與論述而操作的政治暴力，是以隱匿的方式進行，而成為不可見，甚至成為無意識的驅動力。<sup>12</sup> 本文的意圖正在於直接討論中華帝國儒教政治神學充滿悖論的「文明性政治」及其殖民性格。

#### 四、21 世紀天下秩序的轉型

本文同樣關心的問題是：為何 21 世紀會再度高調出現「天下論述」？21 世紀的天下佈局，如何實踐了中國的天下構想？「天下」這個詞彙所牽動的發言視角與物質環境，發生了什麼改變？當代的「天下」圖景要透過什麼樣的基礎建設來支撐？如何透過論述構成以及物質實踐而達成？

更具體的說，什麼樣的自我想像，會構築出 21 世紀的「天下」視野？這個「天下」的競爭對象在何處？當代中國崛起的天下擔當，「天下一家」、「和諧共生」，是要透過中國的「一帶一路」或「數位絲路」來完成嗎？或者，其他的政治角色也要加入這個「天下」的競逐，如目前美國所搭建的各種部署？

近三十年在大陸風起雲湧的中國和平崛起論述，伴隨著儒學復興運動、大一統、通三統、新法家的大量出版，展現出了龐大的「天下」論述版圖。除了趙汀陽的《天下體系》一系列著作之外，蔣慶與甘陽（蔣慶 2014a, 2014b; 甘陽 2007）等人強調恢復中華文明的特性與共同的文化認同，朝向大同世界的「太平世」，「天下將無國土之分，無種族之分，無兵爭之事」。中國內部以及國際學界也出現了無以數計的「天下體系」論述以及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著作，或是類似「建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本體論」、「建構中國崛起的對外文化戰略」、「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閻學通 2009, 2013; 秦亞青 2021）。

中國的天下體系視野，透過「一帶一路」計畫，展開了多方位的全球網

12 可參考（劉紀蕙 2024）。

絡。<sup>13</sup> 2013 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One Belt One Road），該年 9 月 7 日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中，習近平以漢代張騫出使中亞，開闢連結歐亞的絲綢之路作為引子，期待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一路」的倡議強調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互贏、經濟共榮、貿易互補、民心相通。截至 2024 年 3 月，已經有 154 個國家和 32 個國際組織，簽署了 200 多份「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習近平在 2023 年 10 月 18 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致詞中表示，過去十年已經建設了「一帶一路」的「大寫意」，也已經進入了「工筆畫」階段，「把規劃圖轉化為實景圖」，「從硬聯通擴展到軟聯通」。習近平（2023）強調，「人類是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因此，絲路精神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

中國約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國際貿易採取海線，因此海上絲路是一帶一路的重要一環。由中國企業建造的港口有 62 個，中國企業擁有並且經營的港口有 54 個，總數為 116 個海外港口。中國的一帶一路打開了遍佈世界中國經營的一百多個海外港口以及更多的海外經濟特區，控制了全球石油運輸以及商業軍事樞紐（choke point）的重要港口與海峽。<sup>14</sup> 爲了要掌握對於海外港口的主控權，中國將深圳的特殊經濟區模式，擴展到海外港口的特殊經濟區（SEZ，或是海外經濟貿易合作區（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所謂「深圳模式」的特殊經濟區，是指「港口 - 園區 - 城市」（Port-Park-City）的三層結構，結合了在前端的港口負擔倉儲與運輸的流通功能，中間的園區負責加工生產的各式工廠，後端的城市則提供各類餐廳、旅館、遊樂設施等服務。中國在港口城市附設了經濟特區，提供園區土地以及免稅（關稅、貨物稅、營業稅、服務稅等）、免審、免檢、快速通關、特殊行政管道等優惠，以吸引中國以及外國投資者開發。156 個海外特殊經濟區或是海外經濟貿易合作區中，139 個

13 這一系列的行動，包括改革開放以來的「走出去」戰略，以及從鄧小平、胡錦濤到習近平的階段性的五年計劃—1992 年八五計畫：「沿邊開放戰略」（Open Border Cities）；1996 年九五計畫：「走出去戰略」（Go Out Policy）；1999 年西部大開發。2002 年啓動的孔子學院（國家漢辦），十年內，耗資二十億打造孔子學院。

14 包括巴拿馬運河、出入蘇伊士運河的吉布地港口（Djibouti），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的瓜達爾港口，麻六甲海峽。多數港口城市租借給中國 60 年或是 99 年，包括馬六甲門戶（Malaka Gateway）99 年，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99 年，馬來西亞的關丹（Kuantan）60 年，汶萊的摩拉港口（Muara）60 年，緬甸的皎漂（Kyaukpyu）50 年，馬爾地夫的婁度婁諾羅（Feydhoo Finolhu）50 年，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口（Gwadar Port）4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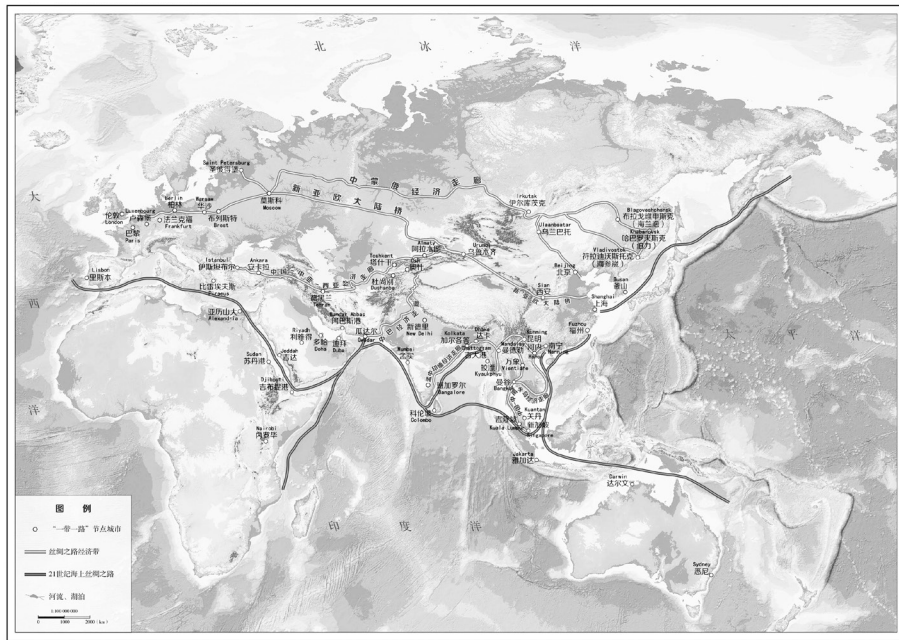


圖 7 一帶一路經濟走廊及其途徑城市地勢圖（未來智者 2023/10/18）。

座落於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協議書的國家中。此外，當前中國一帶一路的策略，控制重要海港，使負載高達百分之八十五的吉布地（Djibouti）將通往蘇伊士運河的紅海軍港讓給中國，或是中國要在泰國開發克拉運河（Kra Canal），避開馬六甲海峽，以及中國買下的斯里蘭卡的科倫坡港（Colombo）、巴基斯坦的卡拉蚩（Karachi）與瓜達爾港（Gwadar）、埃及的塞得港（Said）、土耳其的康普特港（Kumport）、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馬來西亞的巴生港（Klang）與皇京港（Melaka Gateway）、澳洲的達爾文港（Darwin），都是發展掌控咽喉點的戰略，確保能源通道不受其他國家影響。這些港口都是商業物資以及軍事戰略的物流部署重要據點。中國的一帶一路策略，逐步掌握咽喉點（choke point），替代了 19 世紀與 20 世紀的殖民擴張控權，展現了中國介入全球經濟貿易版圖的 21 世紀戰略地圖規劃。<sup>15</sup> 正如本人（Liu 2020）在〈一帶一路，物流與全球基礎設施：新世界秩序：圍棋，或是勢的部署〉一文中所分析，

15 東南亞與南亞國家最早簽訂 BRI 協議，並且開發特殊經濟區的港口城市包括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以及中巴經濟走廊，緬甸若開邦的皎漂經濟特區（Kyaukphyu SEZ），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Sihanoukville SEZ），寮國的磨憨／磨丁經濟特區（China-Laos Mohan-Boten SEZ），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港灣（Malacca Gateway）。



中國的一帶一路所鋪展出的，如同一場漫長的圍棋，是一個掌握天下局勢的長時段規劃。

另外一個快速發展的現象，則是數位絲路帶動的智慧城市以及數位監視技術。根據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趙磊的說法，「一帶一路」自 2013 至 2023 年的十年經驗，目前不僅要「走出去」，還要「走進去，走上去」。解決技術上「卡脖子」的問題，讓世人接受中國企業的文化價值。除了將基礎建設的「硬聯通」假設好之外，還要有規則標準的「軟聯通」作為支撐，加上共建國家的「心聯通」。更重要的是要講好故事，更新故事，積極推動數字絲綢之路，包括 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興基礎建設，以及綠色絲綢之路與健康絲綢之路。2017 年啟動的數位絲路積極發展大數據、雲端運算以及智慧城市。中共於 2019 年執行「天網計畫」（Skynet），稱之為「雪亮工程」。全國三分之一的縣市都購買了監控設備。天網配合著 2014 至 2015 年積極推廣的「網格化管理」，由多個網格員分別負責管理各個網格內的居民事務，包括資訊採集、政令宣導、排查糾紛等，儼然將歷史中的保甲制度復甦於當代（張捷、王詩宗 2024）。2023 年由德國與荷蘭合作製作，張嘉玲導演（Zhang 2023）的紀錄片《全面監視》（*Total Trust*），充分顯示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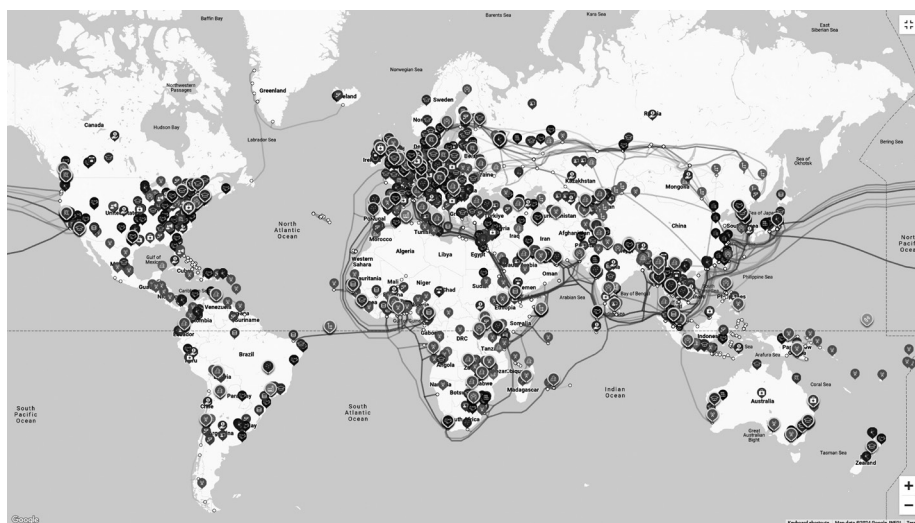


圖 8 中國科技公司海外據點，包括光纖電纜、5G 基礎設施、智慧城市和資料中心（ASPI's International Cyber Policy Centre 2026）。

中國監控威權的內幕。中國利用智能科技以及大數據監控系統，透過天網系統、社區網絡以及社會信用體系，對人民進行全方位的控制，在疫情期間尤其嚴峻。保甲制度模式的「網格化管理」以及街坊鄰居打小報告的參與式監視體系，也發揮的淋漓盡致。

海康威視從輝達公司（Nvidia）購買了可編程晶片，可以訓練人工智慧演算法。2019 年，海康威視銷售超過一百五十個國家。華為、海康威視（Hikvision）以及大華科技（Dahua Technology），在全球生產佔全球總量百分之四十的監視器，提供八十多個國家使用中國監視技術。觀察家指出，中國正在輸出威權主義（Hillman 2021; Miller 2022; Liaropoulos 2022; Bradford 2023）。根據 2024 年的一份統計，已經有 6000 個科技企業在 BRO 的入口網站註冊，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投入科技產業，至少有 16 個國家簽訂的數位絲路的協議書。<sup>16</sup> 中國科技公司已經建造了 116 個智慧城市，其中有 70 個國家是 BRI 的夥伴國家。除了提供無線網路、5G 網絡、建造智慧城市、安全城市之外，華為還協助當地政府建造監視系統（Institute for Computational and Data Sciences 2024）。由中國杭州海康威視開發的監視器，甚至可以進行種族化的臉部辨識，而針對新疆維吾爾族人進行監視。中國在全球各國設置了海外警務站、海外 110、「數位天下、天涯若比鄰」、警僑事務海外服務站，共計 102 個據點，監視海外流亡者或是異議人士，並強行執法。這些無處不在的監控系統與數位設施，以及向外蔓延的警僑事務海外服務站，似乎說明了趙汀陽所提出的世界的「無外」監護體系，監護世界以共在為存在的方式。

這些物質性的全球部署，就是我們眼前看到正在發展中的世界局勢。趙汀陽所說的「新天下主義」提供世界的「無外」監護體系，監護世界以共在為存在的方式，就是這個「天下」圖景？

目前多極化的世界局勢，是否有不同的強權要介入這個天下圍棋的棋局？

16 亞洲國家包括孟加拉、寮國、緬甸、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韓、土耳其。中亞國家包括卡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圖門尼斯坦。非洲包括安哥拉、吉布地、埃及、衣索比亞、肯亞、奈及利亞、桑比亞。中東包括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拉丁美洲包括古巴、墨西哥、秘魯。歐洲包括捷克、匈牙利、波蘭、薩爾維亞、愛沙尼亞、英國。

## 五、結論：「餘」的位置與視角的轉移——共生的起點

當「生」的意志旺盛，生生不息，擴張空間，建立天下秩序。這個「天下」能夠容納同一個空間之內不同意志的「生」嗎？

中國歷代君王多將天下土地與人民視為自家的財產，山林川澤收歸國有，鹽鐵專賣，壟斷貨幣，納重稅，以至於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流民遍野，甚至易子而食的情形，屢見不鮮。面對君主專制，土地財富被權貴私有化，掌權者以仁義之名遂行私欲而殺奪，我們要如何揭露這種被儒教政治神學所支撐的「天下」權力背後的制度性複製與自我合理化的殖民認識論？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約 1943 年）維吾爾族歷史學者翦伯贊撰寫〈略論中國史研究〉時，造已經指出一個重要的史觀：要理解中國歷史全面的運動，不能夠僅看漢族歷史，而要同時看周邊民族的歷史，包括蒙古高原系人種，以及南太平洋系人種。帝國歷朝歷代持續受到周邊民族的威脅，例如周朝的嚴允，秦漢的匈奴，晉的五胡，南北朝的鮮卑，隋的吐谷渾，唐的吐蕃、南詔，宋的契丹、女真、韃靼，明的瓦剌、阿魯台、女真。中國從周代開始到秦漢隋唐各朝，由於其發展擴張以及周邊民族之間的折衝，也牽動了中亞以及歐洲的歷史過程。由於這些相互牽動的歷史，中國也從周代開始就先後接觸了希臘文化、羅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翦伯贊 2008b: 9-12）。<sup>17</sup>

除了這個重要的史觀之外，我認為翦伯贊提出的方法論更值得我們參考。<sup>18</sup> 翦伯贊強調，除了不能夠將中國歷史抽離於世界歷史之外，還必須從龐大的歷史資料中，析理出貫通於千頭萬緒的歷史事實之中的「原理」，瞭解歷史發展所表現出的現象「怎麼樣」發生以及「為什麼」如此發展。翦伯贊反對僅以編

17 翦伯贊舉了兩個漢書提及的史實為例，說明兩漢期間西域種族擴張所牽動的歐洲歷史：西漢初匈奴南遷，迫使原居於甘肅山谷間的月氏人西遷，越過蔥嶺，而驅逐了今阿姆河地區的希臘人勢力，使原先居住於烏孫國（今吉爾吉斯斯坦、新疆與哈薩克的交界處）的塞迦人（Saka）南遷至屬賓（Jibin，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休循（今吉爾吉斯斯坦）等地。月氏隨之又攻克希臘—巴特里亞王國（Greco-Bactrian Kingdom），在巴特里亞（Bactria）定居，使「大夏」向其臣服，而成為了中亞的共主，也使得西羌的一支西徙中亞。另外一例則是兩漢北擊匈奴，北匈奴開始西遷，擴及歐洲多瑙河流域及波河流域，造成歐洲東北諸族的威脅，而加速了日耳曼人的南遷，從而促成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

18 余英時稱翦伯贊是燕京大學「四大真空管」之一，質疑其學問空疏，並且懷疑其著作在史學上的地位，也懷疑後人是否能從他的著作中繼續得到啟發，見（余英時 2010/07/29）。然而，我並不同意余英時的批評。我認為翦伯贊提出的方法論，正好提供了靠近歷史現實，並且從歷史事實中思考其原理，也就是方以智所言「物」之交會的「所以然」的道理。

年史記事或是作傳；傳統編年史學雖然有類聚條分之效，卻無法整理錯綜複雜的邏輯。他也反對清朝乾嘉學派所強調「點點滴滴」疏通訓釋輯補的瑣碎工作，更反對以外來的歷史學科原封原樣地輸入中國，而使得中國史成為西洋史的翻版。翦伯贊強調，中國歷史既不是例外，不會脫離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法則，也不會在一般法則之下失去了其內部發展的特殊性，也就是歷史過程中的社會客觀條件以及當時受牽動的人物主觀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進入了中國歷史豐富的資料，便可以分析不同歷史時刻的社會經濟內部軋轢的政治表現，也可以思考對於這些社會經濟狀況回應的改變或是保守的作用。翦伯贊指出，這些主觀的作用可能會帶出例如張騫、班超、衛青、霍去病等人協助朝廷在兩漢期間對西域擴張經營，也可能會帶出例如石敬瑭出賣燕雲十六州，導致契丹對宋朝的威脅；汪伯彥、秦檜、張邦昌、劉豫等人的賣國投降，而導致北宋滅亡；洪承疇、吳三桂等人開門揖盜，引滿人入關；更可能會有不同的人物領導農民叛亂，帶來變局。在這些無數的個人活動中偶然的湊合與相續的遞嬗，構成了中國歷史的運動與發展。若要準確掌握這些變化的內部邏輯，便必須研究不同對立集團的內部分化與變動，例如中國歷史中的宗藩、外戚、宦官、地方仕紳等，以及內部矛盾牽動的外部邊疆民族之間的矛盾變化，以便理解中國歷史中社會關係以及制度變遷的複雜因素（翦伯贊 2008b: 7-22）。翦伯贊的這種觀點，就是我所謂的多點漩渦運動的重疊、交會、分歧的動態歷史過程。

歷史過程並不是單一向心漩渦的重複發生，而是不同權力中心與不同的存在意志出發，而發展出不同幅員的擴張運動。歷史運動多點進行的多重權力漩渦，以物質辯證的往復交會萌生，就是我們要討論的「歷史本體論」，也就是歷史運動的「存在—邏輯」（onto-logy）。歷史環節中持續進行式的存在運動，並不是預先決定的目的循著線性發展，而是在不同歷史時空與不同物質條件、不同背景的行動參與者偶然交會形成的。我們可以透過多點漩渦的模式來思考這個複雜的過程：所謂的「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個聚點。同時段發生的多點運動，或大或小，可能會重疊，也可能會被併吞，更會有不同的歷史敘事出現。

王夫之（n.d.）曾經提出，土地不是帝王的私產，而應該歸耕者所有。「若土，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間，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資以養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恆疇，不待王者之授之。黃宗羲（n.d.）也曾

經批評，皇帝將天下視為自己的產業，「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任意「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類似王夫之與黃宗羲等人能夠對當朝皇帝提出質疑與變法芻議的思想家，歷代也不乏其人。

如何能夠在天下的範疇之下，退一萬步，直指其運作邏輯的偏差，這就需要思想的方法論以及視角的轉移，或是我要提出的「餘」的辯證批判視角。

我曾經透過明末清初方以智的「餘」的觀點，討論如何能夠不囿於權勢與名教，而可以質疑當代掌權者以仁義之名遂行私欲私利而殺奪的行為（劉紀蕙 2023）。此處，我要再次藉由方以智的觀點，說明相對於「天下」的盈滿而膨脹的視角，「餘」的視角如何可以成為分析與批判的起點。

以方以智（2018a, 2018b）的說法，「角、徵、羽」是「商」之餘，「商」是「宮」之餘，意味著五音之轉移之間，後者為前者之「餘」，前者亦為後者之「餘」。五音為無聲之餘。方以智又說，「人適所用，以無用者為餘；知無用之用，則有用者為餘矣。不易有用之用非無用之餘，豈以無用之用廢有用之餘耶？易無體而前用者，善用餘也，即餘而一其體用者也。」有用與無用，也是有無相生、相互轉換的位置。由此可知，「餘」的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相對的、動態的，是在物質條件的可見處觀其不可見之「勢」與「理」的視角。

前文的論述已經指出，「天下」是一個特定的視角，是具有政治神學基礎所支撐與展現的治國野心；「天下」的視角牽動了物質性的體制、機構、法令、學說、軍事部署、以及征戰行動。從不同的主觀位置與歷史情境出發，「天下」可以展開無數不同說法，也可以被不同的主體位置所挪用，並且以抽象理想的烏托邦藍圖，來合理化自身的擴張佔取行為。

相反地，從「餘」出發，轉換視角，在「天下」的極限之處思考，則可以啟動分析與批判的思想運動，檢視這個天下視角的膨脹如何造成實質上的壓迫體制，以及如何遮蔽了無法出現的「餘」。此外，「餘」的位置轉換，不僅只是流動變化，而是在不同的物質結構下調動視野，維持先後、陰陽、動靜、明暗相對並存的辯證張力，而觀察其發展的趨勢。如果徒守後而忽略了前之倏忽即逝，便是執著於一而廢百。因此，「餘」並不是一個固定的視角或是永遠流動的位置。



「餘」提供的不是相對於「滿」的固著僵硬位置，而是在物物交會之際，觀察其陰陽動靜的不同趨勢與所以成之理，其權勢之所依以及如何會造成憂患、悔恨、恥辱的「憂悔吝」的位置。

分析趨勢可徵之「幾」與幾之「表法」，就是方以智提出的「物論」的符號學，並且提出「疑人之所不疑」，進而「疑法何以謂法之法」。

在天下視角之下，征戰擴張必然是前鋒，「禮法」與「名教」則是用來穩定倫理關係的說詞工具與治理技術，而「刑」必然隨之而來。康、雍、乾時期所高度張揚的禮教，制定各種禮儀典章制度，編纂禮記、大清通禮、四庫全書，強調以「孝」治天下，鼓勵宗祠鄉里的尊卑名分之約規，穩固保甲連坐制度，進而廣蒐遺書而執行文字獄，銷毀數萬部書籍，牽連數代上千萬人，就是從禮到法的完整治理技術。

思想控制造成的效果，便是無法發言的恐懼。如同譚嗣同曾經說明過，權勢積累者以「忠孝」、「天命」、「國憲」等「共名」，來固定尊卑等差的對待關係，區分善惡區分，作為刑罰之依據：「中國積以威刑箝制天下，則不得不廣立名為箝制之器。如曰仁，則共名也。」這種遮蔽天下的名教，如同「丰其蔀，日中見斗」，造成了人世間認識事物的黑暗狀態。譚嗣同指出，「此其黑暗，豈非名教之為之蔀耶？」在此體系之下，施政者與追隨者皆毫不懷疑地遵從此體系之「法」，並執行其「惡」，嫌忌、侵蝕、齟齬、屠殺，而「人不以為怪」。相對於共名與專名，譚嗣同強調要維持心之「微生滅」，保持「通」的狀態，也就是破除以「共名」與「專名」所設之內外與層級，破除彼此與我他之別，破除對待，以「變」來達到「平等」（劉紀蕙 2011: 192-193, 197-198）。

這個破除對待的「通」與「變」，揭露「天下」膨脹視野之極限，就是「餘」的視角。方以智提出的「因物知則」，是要分析物物交會之邏輯。這個視角必須在不同的時間交會點，都能夠根據交會時刻的歷史時空與物質條件，分析世變的趨勢，並且觀察單一視角所無法意識到的邊緣。從這個「餘」的視角觀看，才能夠分析「義隨世變而改」的「所以然」之理，並且直指單一視角以及名教體系的遮蔽邏輯。

一般討論殖民性的學者，多半以歐陸帝國擴張的海洋時期作為起點，並且

認為殖民主義是作為種族治理的權力關係，與現代性相互生成。這種論斷侷限於歐美、南亞或是拉美學者所批判的歐洲中心主義以及以西方所定義的「現代性」。但是，如何定義「現代性」？為何是「西方」？殖民體制為何不會在「東方」發生？17、18世紀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的土地擴張，軍事征服深入中亞與東北亞，版圖擴張比明朝超出達到900萬平方公里的差距，其擴張的總面積有西歐的2倍，印度的1.5倍。這個征戰過程中同化與殲滅的族群地區，包括青海、新疆、西藏、內蒙、貴州、四川、雲南。以「天下」統攝周邊地區，加諸以「禮制」對待，文字獄鞏固，建立種族差別對待，這算不算是「現代性」？或者，以「天下治理」的「殖民性」來理解，會更為準確？

相對於「天下」的膨脹視野，我認為，以方以智所提出的「餘」的物質辯證視角，分析事態趨向之「幾」以及可徵之「符」，指出作為中介的「名」與「法」的體系，以及體系性權勢運作的壓迫模式，是分析與時俱進、具有差異性治理機制的殖民體制的起點。如果能夠透過「餘」而打開一個轉換的空間，進而批判被佔滿的制度與壓迫性的秩序，以相對位置思考彼此的「生」，或許才能夠空出無數個可以「共生」的空間，也才是解開殖民認識論的批判思考實踐。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書目

- Anonymous. n.d.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 *Qing gao zong chun huang di shi lu*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of the Qing]. 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資料庫 (Academia Sinica Database of Chinese Texts)。
- Anonymous. n.d.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 *Qing sheng zu ren huang di shi lu*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Kangxi Emperor of the Qing]. 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資料庫 (Academia Sinica Database of Chinese Texts)。
- Perdue, Peter (濮德培) 著, 葉品岑 (Ye, Pin-Cen)、蔡偉傑 (Wei-Jie Cai)、林文凱 (Wen-Kai Lin) 譯。2021。《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 *Zhongguo xizheng daqing zhengfu zhongyang ouya yu menggu diguo de zui hou wang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臺北 (Taipei)：衛城出版 (Acropolis Publishing)。
- 尹金欣 (Yin, Jin Xin)。2011。〈清代文字獄和禁書運動〉“Qingdai Wenziyu he Jinshu Yundong” [Qing Literary Inquisition and Campaigns to Ban Books]，〈開封大學學報〉 *Kaifeng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Kaifeng University] 25(1): 48-50。
- 方以智 (Fang, Yi-zhi)。2018a。《易餘》 *Yi yu* [Suplus of Change]。合肥 (He 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 。2018b。《東西均》 *Dong xi jun* [Equilibrium of Things]。合肥 (He 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 王夫之 (Wang, Fu-zhi)。n.d.。《噩夢》 *e meng* [Nightmare]。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Chinese Text Project)。
- 司馬光 (Si-ma, Guang)。n.d.。《資治通鑑》 *Tsu Zhi Tong Jian* [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Chinese Text Project)。
- 司馬遷 (Si-ma, Chien)。n.d.。《史記》 *Shi ji*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Chinese Text Project)。
- 未來智者 (Weilai Zhizhe)。2023/10/18。〈一帶一路經濟走廊及其途徑城市分布地勢圖〉“Yi daiyi lujing jizou langjiqitu jingcheng shifen budi shitu” [Topographic Map of the Belt and Road Economic Corridor and Its Pathway Cities]，*Wikipedia*。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lt\\_and\\_Road\\_Initiative#/media/File:%22Belt\\_and\\_Road%22\\_economic\\_corridor\\_and\\_its\\_path\\_city\\_topographic\\_map.jpg](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lt_and_Road_Initiative#/media/File:%22Belt_and_Road%22_economic_corridor_and_its_path_city_topographic_map.jpg) on April 5, 2026。
- 甘陽 (Gan, Yang)。2007。《通三統》 *Tong san tong* [Uniting the Three Dynasties]。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 甘懷真 (Gan, Huai-Zhen)。2022。《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 (增訂版)》 *Huangquan, liyi yu jingdian quanshi: Zhongguo gudai zhengzhi shi yanjiu* [Imperial Power, Ritual,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s: Studies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Revised Edition)]。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2024。《天下的誕生：巫教、上帝與儒教國家》 *Tianxia de dansheng: Wujiao, shangdi yu rujiao guojia* [The Birth of Tianxia: Shamanism, God, and the Confucian State]。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min Book Co.)。
- 托克托 (Toqto'a)。n.d.。《金史》 *Jin shi* [History of Jin]。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Chinese Text Project)。
- 余英時 (Yu, Ying-Shih)。2010/07/29。〈中國學術傳統破壞得太厲害〉“Zhongguo xueshu chuantong pohuai de tai lihui” [The Chinese Scholarly Tradition Has Been Too Severely Damaged]，〈騰訊歷史〉 *Tengxun lishi* [Tencent History]。Retrieved fro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211142717/https://news.qq.com/a/20100729/000844.htm> on Feb 11, 2021。

- 宋廉 (Song, Lian)。n.d.。《元史》*Yuan shi [History of Yuan]*。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資料庫 (Academia Sinica Database of Chinese Texts)。
- 李唐 (Li, Tang)。1979。《漢武帝》*Han Wudi [Emperor Wu of Han]*。臺北 (Taipei)：河洛圖書出版社 (Ho Lo Books Publishing)。
- 杜正勝 (Du, Zheng-Sheng)。2023。《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的速寫》*Zhongguo shi zenme xingcheng de: da lishi de suxie [How China Was Formed: A Sketch of Macro History]*。臺北 (Taipei)：遠足文化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s)。電子書。
- 汪暉 (Wang, Hui)。2025。《多重世紀時間：帝國、革命與跨體系運動》。*Duochong Shiji Shijian: Digu, Geming yu Kuatixi Yundong [The Multiple Times of a Century: Empire, Revolution, and Trans-systemic Movements]*。北京 (Beijing)：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林存陽 (Lin, Cun-Yang)。2010a。〈禮樂百年而後興 (上)——禮與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構〉“Li yue bainian er hou xing (shang)” [Ritual and Political Order in Early Qing (Part I)]，〈井岡山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Jinggangsh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31(2): 123-132。
- 。2010b。〈禮樂百年而後興 (下)〉“Li yue bainian er hou xing (xia)” [Ritual and Political Order in Early Qing (Part II)]，〈井岡山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Jinggangsh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31(3): 121-126。
- 金性堯 (Jin, Xing-yao)。1989。：《清代筆禍錄》*Qingdai Bihuolu [A Record of Literary Persecu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香港 (Hong Ko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范文瀾 (Fan, Wen-lan)。2009。《中國通史簡編》*Zhongguo tongshi jianbian [A Concis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收入《范文瀾全集》第8卷 *Fan Wenlan quanji di 8 juan [Collected Works of Fan Wenlan Vol. 8]*。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班固 (Ban, Gu)。n.d.。《漢書》*Hanshu [Book of H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秦亞青 (Qin, Yaqing)。2021。《世界政治的關係理論》*Shijie zhengzhi de guanxi lilu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 (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1930。《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Daqingwan nianyi tong tian xiaquantu [The Great Qing Dynasty's Complete Map of All Under Heaven]*。Retrieved from: [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3000046](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3000046) on July 8, 2024.
- 常建華 (Chang, Jian-hua)。2013。〈雍正朝保甲制度的推行——以奏摺為中心的考察〉“Yongzheng Chao Baojia Zhidu de Tuixing —— Yi Zouzhe wei Zhongxin de Kaocha”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ighbourhood Administrative (Baojia) System in the Yongzheng Period: An Examination Concentrating on Memorials]，〈故宮學刊〉*Gugong Xuekan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10: 74-122。
- 張捷、王詩宗 (Chang, Jie and Wang, Shih-Tsung)。2024。〈網格化管理：中國基層治理的基礎設施〉“Wanggehua guanli: Zhongguo jiceng zhili de jichu sheshi” [Grid Management: The Infrastructure of China's Grassroots Governance]，〈治理研究〉*Zhili yanjiu [Governance Studies]* 40(5): 42-52。
- 張運明、王瑞 (Chang, Yun-Ming and Wang, Rui)。2008。〈順、康、雍、乾時期封建文化建設初探〉“Shun, Kang, Yong, Qian shiqi fengjian wenhua jianshe chutang” [Feud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Shunzhi-Qianlong Periods]，〈金陵科技學院學報〉*Jinling keji xueyuan xuebao [Journal of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2): 34-37。
- 習近平 (Xi, Jin-ping)。2023。《習近平談「一帶一路」》*Xi Jin-ping tan yi dai yi lu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23)]*。北京 (Beijing)：中央文獻出版社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 許成鋼 (Xu, Cheng-gang)。2024。《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Zhidu Jiyin: Zhongguo zhidu yu jiquanzhuyi zhidu de qiyuan* [Institutional Genes: The Origins of China's Institutions and Totalitarianism]。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陳怡文 (Chen, Yi-Wen)。2023。《大清之勢和邊界：十八世紀初期大清的對外關係》*Daqing zhi Shi he Bianjie: Shiba Shiji Chuqi Daqing de Duiwai Guanxi* [Propensity and Boundaries of Power: Qing's Foreign Relationships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 (Yangming jiao tong daxue shehui yu wenhua yanjiusuo boshi lunwen) [Ph.D. Disserta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揚雄 (Yang, Xiong)。n.d.。《長楊賦》*Fu of Changyang* [Rhapsody on the Long Yang Palace]。Retrieved from: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9%95%B7%E6%A5%8A%E8%B3%A6> on April 11, 2026.
- 黃宗義 (Huang, Zhong-xi)。n.d.。《明夷待訪錄》*Ming yi dai fang lu* [Waiting for the Dawn: A Plan for the Prince]。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Chinese Text Project)。
- 葉高樹 (Ye, Kao-shu)。2024。《首崇滿洲的多民族帝國：清史》*Shouchong Manzhou de Duominzu Diguo* [Putting the Manchu First in a Multiethnic Empire: A History of the Qing]。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nking Publishing)。
- 葛兆光 (Ge, Zhaoguang)。2011。《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zhaizi zhongguo chongjian youguan "zhongguo" di lishi lunshu* [Here in "China":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Discourses of China]。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14。《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He wei Zhongguo: Jiangyu, minzu, wenhua yu lishi* [What Is China? Territory, Ethnicity, Culture, and History]。香港 (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趙汀陽 (Zhao, Ting-Yang)。2003。〈天下體系：帝國與世界制度〉“Tianxia tixi: diguo yu shijie zhidu” [The Tianxia System: Empire and the World Institution]，《世界哲學》*Shijie zhixue* [Global Philosophy] 5: 2-33。
- 。2015。〈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神學概念〉“Zhongguo zuowei yige zhengzhi shenxue gainian” [China as a Political-Theological Concept]，《江海學刊》*Jianghai Xuekan* [Journal of Rivers and Seas] 5: 12-30。
- 。2016a。〈作為方法論的中國〉“Zuowei Fangfalun de zhongguo” [China as Method]，《山西師範大學學報》*Shan xishi fan da xuexue bao* [Bulletin of Shangxi Normal University] 45(2): 5-13。
- 。2016b。《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像》*Tianxia di dangdaixing: shijie zhixu di shijian yu xiangxiang* [A Possible World of All-under-heaven System: The World Order in the Past and for the Future]。北京 (Beijing)：中信出版社 (CITIC Press)。
- 。2016c。《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huici zhongguo: zuowei yige shenxing gainian de zhongguo* [The Making and Becoming of China: Its Way of Historicity]。北京 (Beijing)：中信出版社 (CITIC Press)。
- 。2023。《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tian xiati xishi jiezhi duzhe xuedao lun* [The Tianxia Syste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Institution]。北京 (Beijing)：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劉紀蕙 (Liu, Joyce C. H.)。2011。《心之拓撲：1895 事件後的倫理重構》*Xin zhi tuopu: 1895 shijian hou de lunli chonggou* [The Topology of the Heart: Ethical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1895 Incident]。臺北 (Taipei)：行人出版社 (Flâneur Culture Lab)。
- 。2017。〈知識型的符號混成與內部殖民：重探儒家的天人合一與自我創造性轉化〉“Zhishixing de fuhao huncheng yu neibu zhimin: chongtan rujia de tianren heyi yu ziwo chuanguang zao xing zhuanhua” [Symbolic Hybridization and Internal Colonization]，《東亞觀念史集刊》*Dongya guannianshi jik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13: 209-248。



- 。2023。《心態史拓撲學：如何面對當代？如何理解歷史？》*Xintaishi tuopuxue: Ruhe miandui dangdai? Ruhe lijie lishi?* [Topology of Mentalities: Facing the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History]。臺北（Taipei）：時報人文出版（China Times Publishing Group）。
- 。2024。〈佛洛伊德、巴禮巴與「文明性」的悖論：政治拓撲學的難題〉“Fo luo yi de balibayuwen mingxingdebolunzheng zhi tuo pu xuedenan ti” [Freud, Balibar and the Paradox of Civility: The Aporia of the Political Topology]，《文化研究》*Wenhua yanjiu*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38: 11-41。
- 翦伯贊（Jian, Bo-zan）。2008a。《翦伯贊全集 中國史綱第二卷：秦漢史》*Jianbozan quanji zhongguo shigang di er juan qin han shi* [The Complete Works of Jian Bozan.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Vol. II: The Qin-Han Period]。石家莊（Shi jia 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Hebei Education Press）。
- 。2008b。《翦伯贊全集 第三卷：中國史論集》*Jianbozan quanji di san juan zhongguo shilun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Jian Bozan.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Vol. III: Essays on Chinese History]。石家莊（Shi jia 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Hebei Education Press）。
- 蔣慶（Jiang, Qing）。2014a。《公羊學引論：儒家的政治智慧與歷史信仰（修訂本）》*Gongyang xue yinlun: rujia de zhengzhi zhihui yu lishi xinyang (xiuding ben)* [An Introduction to Gongyang Studies: The Political Wisdom and Historical Beliefs of Confucianism]。福州（Fuzhou）：福建教育出版社（Fujian Education Press）。
- 。2014b。《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修訂本）》*Zhengzhi ruxue: dangdai ruxue de zhuanxiang, tezhi yu fazhan (xiuding ben)* [Political Confucianism: The Tur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Revised Edition)]。福州（Fuzhou）：福建教育出版社（Fujian Education Press）。
- 閻學通（Yan, Xue-tong）。2009。《王霸天下思想及啓迪》*Wangba Tianxia Sixiang ji Qidi* [Thoughts of World Leadership and Implications]。北京（Beijing）：世界知識出版社（World Affairs Press）。
- 。2013。《下一個十年：全球變局大預測》*Xiayige shinian: quanqiu bianju da yuce* [Next Decade: the Forecast of Global Order]。臺北（Taipei）：八旗文化（G sa Publishing）。
- 薛理禹（Xue, Li-Yu）。2019。《明代保甲制度研究》*Mingdai baojia zhidu yanjiu* [Study on Ming Dynasty Baojia]。北京（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譚其驤（Tan, Qi-xiang）。1996a。〈夏時期全圖〉“Xia shiqi quantu” [Comprehensive Map of the Xia Period]，《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 *Zhong guoli shidi tuji di yi ce*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Vol.1]，頁1。北京（Beijing）：中國地圖出版社（SinoMaps Press）。Retrieved from: <http://www.guoxue123.com/other/map/pic/01/04.jpg> on April 5, 2026.
- 。1996b。〈西漢時期全圖〉“Xi hanshi qiquantu” [Comprehensive Map of the Western Han Period]，《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 *Zhong guoli shidi tuji di er ce*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Vol.2]。北京（Beijing）：中國地圖出版社（SinoMaps Press）。Retrieved from: <http://www.guoxue123.com/other/map/pic/04/01.jpg> on April 5, 2026.
- 。1996c。〈五代十國時期全圖〉“Wu dai shi guoshi qiquantu” [Comprehensive Map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 *Zhong guoli shidi tuji di wu ce*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Vol.5]。北京（Beijing）：中國地圖出版社（SinoMaps Press）。Retrieved from: <http://www.guoxue123.com/other/map/pic/11/01.jpg> on April 5, 2026.
- 。1996d。〈清時期全圖〉“Qing Shiqi quantu” [Comprehensive Map of the Qing Dynasty]，《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八冊 *Zhong guoli shidi tuji di ba ce*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Vol.8]。北京（Beijing）：中國地圖出版社（SinoMaps Press）。Retrieved from: <http://www.guoxue123.com/other/map/pic/16/01.jpg> on April 5, 2026.
- 覺羅勒德洪等。n.d.《清太宗文皇帝實錄》*Qingtai zongwenhuang dishi lu*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Qing Taizong Wen Huangdi]。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資料庫（Academia Sinica Database of Chinese Texts）。

## 二、外文書目

- ASPI's Cyber Policy Centre. 2026. Mapping China's Tech Giants. Retrieved from: <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homepage> on April 5, 2026.
- Balibar, Étienne. 2004. "Outline of a Topography of Cruelty: Citizenship and Civility in the Era of Global Violence," in *We, the People of Europe? Reflections on 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 pp. 115-13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radford, Anu. 2023. "Exporting China's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rough Infrastructure," in *Digital Empires: The Global Battle to Regulate Technology*. Oxford: Oxford Academic.
- Di Cosmo, Nicola. 1998. "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Inner 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2): 287-309.
- . ed. 2009. *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osch, Jörn. 2007. "Managing Security in ASEAN-China Relations: Liberal Peace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sian Perspective* 31(1): 209-236.
- Frank, A.G. 1969.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González Casanova, Pablo. 1965. "Internal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4): 27-37.
- Habermas, J, translated by T. McCarthy.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Boston: Beacon Press.
- Hechter, Michael.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Hillman, Jonathan E. 2021. *The Digital Silk Road: China's Quest to Wire the World and Win the Future*.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 Hostetler, Laura. 2001.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siung, James C. 2002. "Pacific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orld Order,"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29(2): 99-115.
- . 2012. *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 Myths, Puzzles, Paradoxes and Challenge to Theory*.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 Institute for Computational and Data Sciences (ICDS). 2024.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Resources*.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icds.psu.edu](https://icds.psu.edu). Accessed 5 Apr. 2024.
- Jacques, Martin. 2009.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London: Penguin Press.
- Liaropoulos, A. N. 2022.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Made in China": Installing a Digital Dystopia,"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23(1): 123-139.
- Liu, Joyce C.H. 2019. "The Question of Epistemic Reorientation: What Would Happen When the Orient Becomes Tianxia?" in *Orient, Orientation, Disorientation*, edited by Luca Salza and Orgeest Azizal, pp. 31-46. Istanbul: Édition Mimésis.
- . 2020. "BRI, Logistics, and Global Infrastructure: New World Order, the Game of Go and the Dispositif of Shi (勢)," in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mpac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dited by Alfred Gerstl and Ute Wallenbock, pp. 143-165. London: Routledge.

- Matsudaira, Tokujin. 2022. "Tianxia or Another Grossraum? U.S.-China Competition and Paradigm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3(1): 129-143.
- Miller, Chris. 2022. *Chip War: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 New York: Scribner.
- Millward, James A. 2024. "How 'Chinese Dynasties' Periodization Works with the 'Tribute System' and 'Sinicization' to Erase Diversity and Euphemize Colonialism in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The Historical Journal* 67: 151-160.
- Osterhammel, Jürgen. 1997. *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ing.
- Perdue, Peter. 2010.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mitt, Carl. 2003 [1950]. *The 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Jus Publicum Europaeum*. New York: Telos Press Publishing.
- . 2016 [1942]. *Land and Sea: A World-Historical Meditation*. New York: Telos Press Publishing.
- Stuart-Fox, Martin. 2003. *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ribute, Trade and Influence*. Sydney: Allen & Unwin.
- Tang, Yun. 2023. "The State of the Field The Report X,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of Tianxia," *Dao* 22: 473-490.
- Wolpe, H. 1975. "The Theory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South African Case", in *Beyo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edited by Oxaal, I., Barnett, T. and Booth, D, pp. 229 -25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Zhang, Jia-ling. 2023. *Total Trust*. <https://total-trust.org>.